

(二) 诤友·名士篇

苏觉民

苏觉民，字翰彦，笔名韩彦，广西合浦人，一九一五年农历十月十四日出生于北海。父苏宇兴，别名君栋，有过十年窗下经历。但无心仕进，从商不成，弃儒就医。

母王惠容，渔民家庭出身，在觉民从事革命活动中，曾多方帮助；共生子女十多人，抚养成人只有七人。觉民行五，其嫡侄苏坚，三九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四五年壮烈牺牲，被追认为烈士；其弟朝远，曾参加越共，四九年在越南参加抗法战斗中失踪。

觉民在七、八岁时随家到了涠洲岛经商，曾在此受过颇严格的私塾教育，奠定了他喜爱古典文学的基础。当时老师曾出对联：“镜里芙蓉香无味；”属对，他对以：“月中丹桂我能攀。”属对虽不工整，但于此可见其抱负。从此时起，他喜爱诗词和新诗。青年时代，颇多新诗和词章的创作，薄有时誉。

当中国大革命的风暴吹到了这个边远的小岛时，革命先烈，共产党员江刺横、李鸿飞在岛上组织工会、农会、渔民协会及青年同志社，开展反帝反封建、反贪官污吏的宣传；及其后驱逐岛上法国神甫的斗争，等等，都对他起了深刻的启蒙作用，特别是大革命的失败，反动派对革命党人的屠杀，更激发了他的革命思想和志向。《春风秋雨》等救亡话剧。同时，他和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彭中英、陈信材创办了《南声日报》，由陈信材任社长，他任总编辑。该报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亡的方针、发扬正气、针砭时弊、深受读者欢迎。在广东南路和粤桂边区产生良好的影响。

广州沦陷后，张炎将军就任第七区游击司令，便电邀苏觉民、陈信材、彭中英等到高州，共商如何进一步开展救亡工作。他积极协助张炎在高州六县招考、培训了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三百多人，成立了第七区抗日救亡乡村工作团，经短期培训后，分赴六县的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任第三队长，率领队员五十人，在电白下洞沙朗一带，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三九年春，中共南路特委在高州成立，书记周楠同志，曾找他谈话，拟吸收他入党，由于种种原因，他虽然没有参加组织，但他一直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的事业而不断地努力工作。

一九四〇年夏，张炎因营救释放共产党员周崇和、文允武二人而自动辞职。他随同张炎撤退到湛江后，仍与党员赵世尧秘密出版《青年导报》，揭露反动派的真反共，假抗日的罪行。但因受国民党严密监视，並企图秘密缉捕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下党员陈信材同志，遂建议他打入敌人的心脏里——国民党的军队——工作；在陈的帮助下，于四一年春转到了国民党部队187师工作，並和该师倾向进步的政工队员及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开展了一些工作，曾与军统特务陈汉彪等进行过激剧的斗争，且掩护和营救了不地地下党员如郭杰、曹扬繁、张易生等。至四五年夏，日寇濒于失败前夕，

他因被怀疑为“异党分子”遂辞职离开。同年九月，日寇投降后，他重返该师。当时该师在南雄、始兴缉捕游击队员百多人。他与该师政治部进步人士包浚明密切配合，说服该师师长张光琼无保释放这批游击队员。其后该师北上参加内战，他便称病离开。

一九四六年夏，他由曲江回到广州，继续与陈信材、彭中英、叶春、黄宁婴等同志联系，仍一如既往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其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与组建民盟澳门、中山分部的筹备工作，並任中山分部主委。四七年初，孙中山侄孙孙乾任中山县长，他应邀到伪中山县政府工作，继续与当地开明人士郑彼岸等联系，对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长郑冠英的反动措施，进行合法的斗争。还与中共珠江区地下党组织和中共五桂山区游击队派来联系的卢克诚、吕华等同志接上联系，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作准备。並利用合法身份，了解敌特情况，供应大批“国民身份证”，使在港澳的地下党员及民主人士回乡工作通行无阻。並营救了一些地下党员。至四九年夏，不顾个人安危，说服和策反伪六十二军军长张光琼在香港通电起义，並命令其亲信部队在湛江起义，还策反了中山县伪保警营营长黄锡球等武装起义，挫败了敌人准备大烧大抢石歧的阴谋，使中山获得和平解放，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解放后被聘为石歧市军管会顾问。自一九五〇年以后，直至现在，先后担任：民盟中山县委员会

主委、大公中学校长、民盟广东省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广东省二、三、四届人大代表、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等职。1984年已批准离休。

韩罕明

他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大学教授。是我们许多老党员、老干部的老师，对中国文学有很高的造诣，还有很诚挚的革命热情，他从同情和支持革命，成为真正共产党员。半个世纪来，他走过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同志们、朋友们深切关怀着他。

韩罕明，原名韩朗周，现名是笔名。过去写文章，间或用过“暗如”这个名。

1910年2月出生于广东合浦县附城大石屯村。幼读私塾，后就学于县立五小、二高。1925年考入廉州中学，旧制四年毕业。在中学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革命军进入合浦后，建立国民党组织，校长王宗寰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他是其中一个。当时年轻，不懂什么政治，只参加学生自治会，做些文字工作，还和少数同学组成“鸡鸣社”（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出个小刊，写一些仿效鲁迅笔法的习作。“4.12”以后，只有埋头读书了。

韩罕明在1929年中学毕业，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2年，中文系本科4年，1935年毕业，得学士学位。他在中大时，学的是中国文学，也很热心于社会科学，经常去听邓初民和何思敬这些进步教授的课，也爱读左翼文化书刊，他认识了黄钟（黄

铸夫)，一起参加一些左翼活动。同届同学张存芳，学的是社会科学，对他颇有影响，过通张的关系，认识农学院的张进煊和陈任生，逐步加深交往，共同筹建了合浦留省学会，推动合浦同学抗日进步活动。

1935年毕业后，他和张存芳到广州市三中当教员，校长是合浦教育界前辈罗德清。1936年暑假，蔡振玮被任命为廉州中学校长，邀请韩罕明和张存芳回廉中任教，他负责教务主任。他除抓教务和教课以外，主要是指导协助学生开展抗日宣传，特别重视戏剧宣传。他对戏剧很有研究，对学生要求很严，罗文洪、张文纲、伍雍谊，黄国栋、李廉东等，都是骨干积极分子，戏剧和歌咏在廉中搞的非常活跃。

廉中的抗日进步活动，在杜渐蓬、何世权等人努力下，有了一些基础，蔡振玮、韩罕明、张存芳、钟心这些进步教师主持廉中，学生抗日活动更加蓬勃发展，1938年2月，张进煊通过韩罕明、张传芳的关系，回到廉中担任训育主任，开始建立和发展地下党组织，韩罕明作为进步人士，全力支持地下党的活动。他推动当地上层人士，创办《合浦日报》，韩挂个名义，推荐何世权任主编，这份报纸成为宣传抗日、宣传我党政策主张的进步报纸。

当时，地下党组织领导群众反对奸商走私、支援北中反对反动学阀叶天一和反对托派汉奸李焰生等斗争，韩罕明都站在群众最前列，地下党也通过他，做好地方上层人士的工作，使得广西军和一些反动家伙想镇压也不敢动手。

1938年春，廉中进步学生骨干吴裕春（辛莽）、邹瑜、李廉东等自动前往延安，对合浦影响很大，当地驻军中反动军官来廉中追查，由韩罕明出面接待，用一推三不知对付过去，这些反动家伙也无可奈何走了。

1938年冬，廉中迁往浦北小江。第二年，日寇占领钦县、邕宁，南宁沦陷，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共，合浦县委机关被破坏，在这困难局面下，韩罕明仍和地下党密切合作，团结教育全校师生，坚持抗日进步活动。1940年春，小江发生米案事件，国民党政府派一个大队包围廉中，镇压师生的抗日行动。韩罕明在校长蔡振玮和全校师生支持下，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他同时利用那个姓王的大队长的同学租亲戚关系，劝告他撤走包围廉中的兵力，一场风波到此消散。

不久，廉中就奉命迁回县城，张进煊和一部分红了的学生已先后被迫离校，蔡振玮激予义愤，辞职不干，韩罕明和张存芳也辞职不干了。

1941年初，他和张存芳到重庆找职业，通过师生朋友关系，先后在农林部当科员、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任主任科员，和在重庆学习的张文纲、黄国栋联系上，同时和石康的劳家顺（劳辛）接触，得读到延安的报刊，参加重庆的民盟和进步文化界的活动。在这期间，他写了一些讽刺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杂文小说，发表在桂林的《野草》和茅盾编的《新绿丛刊》等文艺刊物上。

抗战胜利后，韩罕明到了南京，军委政治部三厅整编，他算是编余人员，实际上是失业。

1948年暑假后，由黄国栋介绍到长沙湖南音专任文学教授。是年冬天，他到香港，访问友人祝公健等，目的在于了解形势，学习革命书刊，由祝公健介绍正式参加改组后的民主同盟。回到长沙后，他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和学生一起开展护校和迎接解放工作。

1949年长沙解放后，音专合并于湖南大学，韩调入湖南大学中文系，参加省文联筹备工作。他曾参加赴朝慰问团和土地改革及思想改革运动。

1953年，全国高教进行院系调整，他被分配筹办湖南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教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上课、编写讲义、管行政，还有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业余时间，写了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和一些散文。1957年9月，他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经上级党委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湖南大学恢复办文科，他又被调到湖大，筹办中文系，仍任中文系主任。1963年湖南大学又停办文科，组织调他到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任秘书长，仍兼省民盟的领导工作。

在十年浩劫中，韩罕明被关进牛棚，后送省五七干校劳动达四年之久。在这之前，在机关早被禁闭批斗，在劳动时身中流弹，幸未死亡。他在广东的长子韩梦熊，在广西的次子韩泉初先后被迫害致死。韩罕明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历年积存的图书资料被查抄一空，也够惨痛的了。直到1974年，韩罕明才重新安排工作，省文联早被砸烂，他回到师院，师院现改为湖南师范大学，仍然是中文系教授，不再兼党内和行政工作了。他还是省政协的常委，民盟中央委员，省民盟常委。在文学艺术活动中，他还是中国作协会员，湖南文联委员，湖南作协理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们希望韩老在祖国大好春光的年代，多做学问，写出更多的佳作来。

张存芳(1909-1986)

张存芳，合浦县白石水乡屋面埭村人（现属浦北县大成乡），是原合浦地区知名的民主人士和教育界前辈。半个世纪以来，他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张存芳生于1909年，1924年考入廉州中学，1929年考入中山大学。在中大读书期间，曾受到张进煊、陈任生等合浦籍的进步同学的影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5年夏，张存芳在中山大学毕业，同年秋，到廉州中学任教。次年春夏间，廉

中一批进步学生闹学潮，要赶走主张复古读经、施行法西斯教育的校长范公镇，张存芳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1936年秋，蔡振玮接长廉州中学，张存芳被任为训育主任。1938年春，张进煊到廉中任教，在该校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师生走上街头或深入农村，运用种种形式，宣传团结抗日，反对汪派、奸商运米资敌。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对学生这种爱国行动却进行压制，张存芳不顾顽固派的警告，一如既往地支持学生的抗日活动。

1940年夏，合浦县白石水爆发了武装斗争。顽固派合浦县长李本清和广东第八区保安副司令陈国勋，先后带兵到白石水进行围剿。这时，张存芳已被迫离开廉中，正呆在家里。他同游击队的领导人张世聪等有联系，并向一些受蒙骗的上层人士和国民党军官，宣传张世聪等并不是什么“土匪”，而是坚决抗日救国的好青年，主张“进剿”的军队撤离白石水。这样，他配合地下党的政治宣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诬蔑游击队的可耻谎言。张存芳由于在合浦难于立足，便于1941年夏天去重庆寻求出路。在重庆期间，他曾先后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农林部、农垦局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职，并在那里，结识了打进政治部的地下党员卢怡浩（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军管会秘书处长），并与邓初民等民主人士有交往。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曾任国防部政工局秘书和军事通讯社秘书。由于他赞同共产党团结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和内战的政策，便于1947年毅然加入谭平山、陈铭枢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会，1948年又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利用工作的方便，有意识地把一些国民党军队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告知地下党员声怡浩。1948年底，他调往广州，直至解放前这段期间，他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策反工作，他还把广州地区的军事地图和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亲自带到香港找地下党组织，曾受到当时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接见。他还写文章在华南分局办的《华商报》上发表，揭露国民党军队内部互相倾轧等情况。

1949年10月广州市解放后，张存芳曾任广州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他随同陈汝棠代表政府接收国民大学，并任该校教务处负责人。1950年春，合浦县人民政府电请他回合浦任廉州中学校长，1951年任合浦县副县长，分管文教工作。他还被选为合浦县政协第一、二、四、五届的常务委员。他在任职期间，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1958年，张存芳被错划为“右派”，他虽然受到种种极其苛刻的对待，但他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划问题终于在1980年得到了纠正。后来，曾任合浦县政协的常委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韩师淇(1908-1968)

韩师淇，合浦县石康镇人，1908年出生，在家乡读私塾、小学，在廉中读初中、高中，在中山大学肄业。

在廉中读书时，他和同学杜渐蓬、何世权、何承蔚、陈贻芬等过从密切。1934年初，和何世权、何承蔚、陈贻芬、钟顺资等进步同学，发起组织“艺宫”学术研究会，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出版墙报和文艺刊物，组织时事、哲学、文艺讨论会，把进步同学一百多人团结在这个进步团体内，对廉中的发展进步，对合浦的革命进程，影响是比较大的。

韩师淇在廉中进步同学中，年纪比较大，老成持重，考虑问题比较细致，“艺宫”的发展，他出的力量不少，许多事情都由他出面，他一度担任过学生自治会主席。抗日战争爆发，他放弃学业，从中山大学回来后，从事商业活动。这时候，合浦的地下党已经建立，他和地下党负责人何世权等来往密切，按照地下党的意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石康的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抗日先锋队，他是发起组织者和积极工作者，即使在反共逆流中，他和地下党的同志仍然保持联系，设法资助地下党的活动，是我党的诤友。由于石康是南北交通要道，来往的同志很多，只要找到他，他总是乐意接待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韩师淇仍以商人（贩卖西药）身份出现，担任地下党石康交通站站长，为地下党、游击队接送枪支、弹药、情报等等，经常护送地下党同志出入石康、多蕉、常乐、文利、沙帽岭山区。不少老同志经常出入他的家，如陈明景、黄平、朱家英、穆致昌、周霖、陈光等同志，都是很熟识的。

他经常利用其职业和社会关系，为我们党和游击队收集递送情报，许多情报是很有价值的，1949年有名的武利江歼灭战，我四支队在符志行同志指挥下，歼灭国民党保安团一个加强营的大胜利，就是他提供的准确情报。他是立了大功的。

合浦解放后，他曾担任石康区副区长兼石康镇镇长，对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起着积极作用。为此，他和土匪特务以及隐藏的阶级敌人结下深仇。1950年6、7月间，他的内弟唐其美为其送情报，在常乐板塘尾（北山）被匪徒伏击牺牲，在十年动乱中他被暴徒惨杀，这是反革命报复杀人。

1952年秋，韩师淇调教育战线工作，先后担任过廉州一小校长，合浦一中、合浦农校、廉州中学教师。他勤勤恳恳工作十多年，经常是带病工作，是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战士。1963年7月，他在廉中任教时，因病退休。

在十年动乱中，韩师淇及其家人惨遭迫害，他和两个儿子被剖腹挖心而死。这些杀人凶犯，还给韩师淇捏造了许多“罪状”，伤天害理，到了极点。

直至1983年9月，在许多主持正义的社会人士力争下，韩师淇这个冤案才得到平

反，可是早已弄得家破人亡，无可挽回了。

潘孝彪（1901-1945）

潘孝彪先生是合浦县的著名民主人士，为人公道正直，疾恶如仇，是反对封建邪恶势力的民主战士；他力主抗日救国，拥护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合浦共产党人的诤友，对合浦人民革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1945年我们党领导合浦人民抗日武装起义之后，潘孝彪先生及其长子潘慈航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奸匪”“共匪”罪名先后逮捕杀害，至今已经40年了。

潘孝彪，字寅文，原属广东合浦县（今广西浦北县）小江镇潘屋村人，1901年出生，家庭经济比较富裕，有田产房产若干，在马路坡开有广仁栈瓷厂和商店，为人刚正不阿，富有正义感，胆略过人，能诗善文。1931年被小江工商界推选任小江商会会长，颇受工商各界的拥戴。1934年有个土豪恶霸黄阳，凭藉地方反动势力，在合博两县界河马江东侧博白境内的太平圩继续设置税卡，对来往船筏强行征税。这个税卡已经设立四十多年，残酷盘剥来往商人。潘孝彪根据合浦小江、福旺和博白那林、江宁等地船商筏商和群众的控诉，为维护商民利益，便利物资交流，曾以小江商会名义，向太平税卡交涉，要求其降低税率，但太平税卡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变本加厉，横征暴敛，因此更激起沿江两岸广东广西船商筏商和广大群众的强烈义愤。

潘孝彪为了维护商民利益，对于太平税卡的蛮横行为，先向博白县府提起申诉，接着又向广东、广西两省政府控诉，据广西省政府查复，政府没有在太平圩设有税卡，并责令太平税卡立即撤销。但太平税卡在博白县府庇护下，不但拒不撤销，反而在太平圩尾江边筑起炮楼，招集更多流氓兵痞，继续强行收税，因而更加激起商民的愤慨。潘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发动和组织小江、福旺等地民众1000多人，几百支枪，武装护送几十只竹筏的大米货物，从小江顺流而下，到太平卡时，伪税卡人员开枪射击，强迫停运纳税，当即引起武装冲突，激战数天后，伪税卡人员因孤立无援，又没有政府支持，终波击溃。潘孝彪一面指挥护航武装扫荡逃敌；一面指挥另一支队伍拆毁税卡炮楼，并用大锯、斧头、铁锤破坏江中用木桩造成的车陂。经过紧张的战斗，完全彻底摧毁了这个作恶四十多年的太平税卡，此后，沿江两岸客商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为了表彰潘孝彪的功绩，沿江船筏商人联名送给潘一幅刻有“惠我工商”四个大字的木制匾额。为纪念打垮太平税卡的胜利，1935年10月，各界人士集资在太平税卡对岸合浦境内的良村河边，用花岗岩石料建成一座廉亭，合浦县长陈猛孙亲为廉亭拟写碑记并撰对联一副，潘孝彪亦撰对联一副，文曰：“廉洁励吾身为除暴敛横征数日战争合博风云皆变色，亭凉留客足犹愿熙来攘往千秋浏览东西江水永清流”，贴切地写出了作者的抱负和摧毁太平税卡的经过和意义。

武装摧毁太平税卡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潘孝彪在合浦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他成了清廉刚正，为民请命，敢于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群众领袖。正因为如此，他也就成为以小汪宋族恶霸地主宋寿伯（大种狗）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眼中钉，正义与邪恶的矛盾逐渐激化，于是，就发生了1936年秋的一天深夜，在小江街上潘孝彪被歹徒开枪刺杀的事件，虽然暗杀阴谋未遂，但也埋下了潘以后被捕杀的祸根。

1936-1937年间，潘孝彪曾经到广州、香港等地经商，结识了一批进步开明人士，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大地，亿万同胞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亲身感受到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横征暴敛，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等倒行逆施之不得人心，又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当他1938年回到家乡之后，便和共产党员宋家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曾一同到大成勾刀水会见当地的群众领袖、共产党员张世聪，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在宋、张的积极鼓舞和支持下，潘回小江发动群众，组成一个抗日自卫大队，自任大队长。那时，日寇南侵，在占领广州武汉的同时，占领了北海附近的涠洲岛，不时袭扰沿海各地，自卫大队加强军事训练，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为保乡卫国而战斗。

由于形势紧张，1938年秋冬，中共合浦县党组织决定把共产党员何国达和进步人士陈锡汉合营的印刷厂从灵山搬迁小江。这个厂是铅字印刷厂，旧式印刷机和铅字在内相当庞大笨重，需要较宽大的厂房和较多的搬迁费用，搬迁任务就交给小江区的党员领导干部宋家培负责完成，宋与潘孝彪商量，立即得到潘的大力支持，表示无偿借用潘屋老家作厂房，并尽力解决部分搬迁经费。不久，印刷厂便秘密地迁到小江潘屋村。这个印刷厂是我们党宣传团结抗战的一个重要阵地，除了公开大量印发许多宣传团结抗战的文电通讯之外，还秘密印刷了不少党内教育资料和揭发国民党反共阴谋的布告、代电等等。

印刷厂又是地下党的重要交通联络站，还在这里开过几次重要的会议，谢王岗、庞自、卢文、黄文法、罗瑛、唐才猷、谭俊等地下党的负责人也在这里活动过。潘孝彪通过印刷厂的活动，更加密切了和宋家培等共产党员的联系。印刷厂和交通联络站在潘屋村经营到1941年才又迁往博白那林，在这期间一直安全无恙，潘是起了积极掩护作用的。

日寇占领涠洲以后，内地奸商勾结贪官污吏抢购大米、铜仙、钨砂、桐油等战略物资出境资敌，短时间内粮价飞涨，造成人民生活困难，引起群众极端不满。1940年3、4月间，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发动和领导全县一万多群众起来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小江区委由宋家培负责和潘孝彪联系，潘表示积极支持，并协助发动小江商民参加斗争，潘还派出亲信参加小江反汪大会，前往镇公所请愿，并携枪参加在小江河拦截奸

商运米出境的竹筏等等。潘的这些行动影响很大，表明他完全站在抗日人民一边。他对国民党顽固派武装镇压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极为不满，白石水大成群众在张世聪等发动和领导下，实行武装自卫，和国民党顽固派打了一年多的抗日自卫还击战争，潘孝彪是同情和支持的。此后，他和小江地下党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友谊，也正因为这样，他和小江反动官僚、地主、奸商的矛盾便逐渐尖锐起来。

1944年底，南路人民实行抗日武装起义前，潘孝彪接受了党的委托，利用小江商会会长工作做掩护，秘密配合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1945年2月7日晚，小江起义队伍缴了国民党35集团军分监部驻苏村水的两个据点的武装和小江镇自卫中队的枪。2月14日（农历初二），小江反动镇长宋寿伯策动军警包围广仁堂和商会，企图捕捉潘孝彪，因潘当晚不在，阴谋未能得逞，结果捕去潘的胞兄潘孝彬（耀文）及长子潘慈航，次日即押解廉州囚禁，潘孝彪逃往廉州，并于2月19日具呈八区专员张国元，要求查明省释兄、子，发还被缴枪弹等。5月张到小江，潘亦回到小江，适原35集团军分监、宋寿伯儿子的拜把兄弟夏秀峰活动出任合浦县长，准备到合浦报复泄愤，正走马上任途经小江，即与宋寿伯策划，乘机加罪潘孝彪，第二天即派兵包围潘家广仁堂逮捕了潘孝彪，次日即派重兵押解廉州，囚于东山寺内。经过严刑拷打，潘坚强不屈，敌人只得捏造罪名，诬陷潘孝彪为“奸匪”、“共匪”、“此次抢劫夏分监后方之奸匪……沙江云坊一带奸匪均由潘寅文从中策动接济枪弹”，于6月25日把潘孝彪杀害，时年46岁。10月长子潘慈航亦被国民党反动派诬为“奸匪”加以杀害，年仅20岁。潘孝彪一家的房屋财产全被查抄没收，母亲和夫人惨遭迫害亦先后气愤而死，其余人员四处逃命，才得幸免。

十年内乱期间，四人帮横行造孽，竟把潘孝彪先生打成叛徒，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平反昭雪。今天，全国人民正在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奋勇拼搏，潘孝彪先生九泉有知，也会无限欣慰的。

（刘信汉撰稿）

谢兰仪(1921-1961)

谢兰仪，又名王云，浦北县人。1921年生于合浦县龙门乡（现属浦北县龙镇）新担垌村，家庭是小地主兼工商业者，母亲当家。

谢兰仪在家乡读小学，后来考入省立第十一中（廉州中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廉州高中毕业。他在廉中读高中时，和进步同学韩全周、邱鸿就、李世益、李辛农等接触，受到革命影响，组织秘密读书会，读革命书报杂志，在全国抗日救亡情绪高涨时，他们在钟屋湾村办起农民夜校，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开办费是由谢兰仪捐助，后来学校每月补助灯油费5元，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事。后来农民夜校发展到车路垌、平田、蓝

园等处，教员也发展到 30 余人，何世权等人，也参加一些活动。

1938 年春，张进煊和何世权等先后来廉中工作，合浦党组织开始重建，廉中是建党最早的地方，抗日救亡活动非常活跃，农民夜校得到党组织支持指导，38 年 6 月，党在县城举行抗日大示威，包围国民党县政府，农民夜校动员了 1000 多人参加，谢兰仪在这些活动中，得到很好的教育影响，逐渐成为党的同情者支持者。

高中毕业后，他回到家乡龙门小学当教师，和廖世儒（共产党员）、李焯兴等，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活动，他们建立了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是廖世儒，谢兰仪任副队长，抗先队设在龙门祠堂，活动经费大部份由谢兰仪捐助的，时间是 1938 年冬至 39 年春天。

那时，廉中和北海一中一部份已迁小江，抗日救亡活动在上八团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寨圩、福旺、小江、龙门以及白石水、旧州、张黄等地都先后建立了党组织，谢兰仪不仅是思想进步，倾向革命，而且在实际行动中支持党的活动，如 1945 年春武装起义后，他把他家里存有的长短枪六支（驳壳两支、左轮一支、曲尺一支、七九一支、六八一一支）全部交给许家骅支援起义武装。在党内活动经费困难时，他将家中存有的金银首饰托谢王岗带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在那个年代，一个进步人士如此慷慨支持我们党，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1945 年，因叛徒告密，谢兰仪的身份暴露了，龙门的匪首谢兰香追捕通缉他。他迫得流亡到越南芒街去，跟随医生吴仕规学医，仍然从事革命活动，和地下党同志保持联系，为游击队筹集药品。

1949 年冬，北海解放后，谢兰仪回到北海，参加军管会，搞接收工作。1950 年到 51 年，任合浦医院副院长，51 年到 52 年到广州南方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浦北，在粮食局工作，1956 年以后，担任浦北医药公司经理。

1958 年那股极左的风气下，在整风反右中，谢兰仪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遣送到钦州石膏矿劳动教养，在三年困难、艰苦劳动中，得了肺病和水肿，保外就医，回北海无钱调理，1961 年在北海病逝，时年 40 岁。我们党的一位诤友，就给左撇子以莫须有的罪名葬送了，这些人是违背党的政策，沾污党的声誉的。谢兰仪的问题，在 1984 年经浦北县处遗办予以平反了。

范汝超(1910-1949)

在合浦县人民解放斗争中，作为党的诤友的范汝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范汝超，合浦县公馆乡南山村人，出生于 1910 年，出身军阀官僚家庭，父亲范德星，曾担任过国民党师长、绥靖主任，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情支持革命事业。

抗日战争前，他在广州读书时，和进步同乡同学很要好，如陈铭炎、陈任生、张

进煊等，通过这些人的接受革命思想，对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十分同情和支持。“12·9”运动以后，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运动，著名的荔湾事件，他是个身先别人的积极分子。

1937年9月公馆地方一些反动分子，勾结公馆五中几个败类，煽动罢课风潮，并把进步教师石端、张进煊、何世权软禁起来，范汝超得到消息，不避艰危，冲破反动分子的封锁，慰问张进煊等人，并把这件事的内幕，诉诸社会，挫败反动分子的阴谋，保护了进步师生的安全。

全国抗战开始，合浦地下党组织建立发展很快，公馆、白沙等地都有了党组织，范汝超这时在家闲住，和我们地下党的同志邹贞业、张九匡、张书坚等同志有密切的交往，了解抗战形势和我们党的意见，接受党委托他的任务，是十分主动积极。1938年下半年，地下党在全县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他热情支持，欣然接受担任东三团大队长，干的十分出色。1939年初，抗先队集中一批骨干，在公馆五中进行军事训练，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向国民党自卫大队借了一批枪支作训练用，并且安排我们一些同志，在公馆区抗敌后援会工作。总之，他给我们开展工作出力不少。

1939年5月，地下党合浦县委机关被破坏，陈任生等五位同志被捕。范汝超闻讯，亲自到县城，到县府找伪县长说理，同时又写信给邓世增等人，要求释放陈任生等同志，事虽不成，可见他对我们党一片真诚的心。

在抗日战争艰难的日子里，他仍然和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保持联系，经常向我们提供敌人活动情况。1943年，我们几个党员卢传义等在南山小学教书，开展党的活动，范汝超和我们这些党员联系密切，相处得很好，经常向我们提供国民党的情况，掩护我们的工作。

1945年2月武装起义后，南山成为我们的一个游击据点，他经常向我们提供情报。在公馆，他是个很有钱有势有影响的人物，他的支持帮助，使我们的活动很顺利。他多次提出要参加游击队，我们地下党的意见，以他的身份开展活动，比在游击队更为有利，经过说服，他服从党的意见。

1948年左右，他和陈琪、范坚等同志在北海经商，他们有两艘机帆船，来往香港、北海间，地下党多次通过他们，多次从香港运回枪支子弹，有一次，还给我们地下党运回一部无线电台。这些事，合浦县委钟德辉同志参与其事的。

范汝超这些事，给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1949年7月，公馆的反共大队长张相琦将范汝超逮捕了，并且在押送县城途中，将范汝超秘密杀害了。

事情已过了三十多年，范汝超的家属遭遇很惨，他两个妻子阮瑞贞、阮瑞洁原是小学教师，土改时被扫地出门，作为地主管制；他们亲属在国外，在困难时期寄回衣车用品，被基层干部没收自用，他的几个孩子，被认为是地主仔，找不到妻子。张相

琦做不完的事，有人替他做了。

我们要指出：这样对待范汝超的亲人家属，是不符合我们党的政策！

朱玉光（1886-1954）

朱玉光，原名朱弦山，排行第三，乡里都尊称他朱三叔。1886年出生在合浦县旧州乡（现属浦北县大成乡）北埃村一个农民家庭，是个小康之家，能支持他读书。那时没有学校，他四出读私塾，勤奋好学，读了不少古文，练得一手楷书毛笔字。以后就投师学习中医，抄了许多中医书，保存到现在。

他的进取心颇强，在青年时代，先后办了许多小型工商业，在村里开个中药店，经营过土特产收购运销企业，办过三个水力加工作坊，也办过土法制铁铸锅等等，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都先后宣告失败了，又上了高利贷者的当，家庭经济日趋没落破产。

在大革命时期，在合浦的北部，掀起一股农民自发武装斗争，叫做“保神党”，朱玉光出钱出枪支持过，后来这些自发武装，被地主豪绅和土匪利用，失望之余，他到廉州住了一个时期。

在二十年代，他在闭塞的太成，发起建立圩镇，他带头建了三间房子，还动员说服自己的亲友建了好几间铺面，这就是大成圩的雏型。后来，他把精力放在种植扁柑上，把自己的肥沃田地都种上扁柑，他夫妇俩日以继夜劳动，一连好几年，当然，种扁柑的收益是有限的。

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日益觉醒，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到偏僻的山村。1938年秋冬，张世聪、朱兰清加到大成，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是党指派来开辟山区工作。不久，党还派了何世权、王克、岑月英、许家骅等到大成，建立农村根据地。朱玉光接触到儿子朱兰清和朱菊清，特别是受到张世聪的推动影响，思想有了飞跃进步，他积极参加党的宣传组织农民工作，并从中得到教育。为了支持党的这些活动，他经常从家里拿钱拿米帮助党员维持生活，王克、许家骅、邱鸿就等，都是他家的常客。朱玉光在地方上有威信有影响有号召力，对党建立群众组织和农民武装，他是起着很好的作用。当时旧州、白石水的国民党政权，是非常腐败和反动，他积极参加打倒旧州乡长吴质平和白石水乡长梁文光的斗争，还清算了反动保长包其兴的贪污行为，取得很大的胜利。

在这一年多时间，朱玉光大部分精力都甩在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凡是我们党提出要干的事，他都积极完成，党员和群众都说他是不脱产的干部、未入党的党员。

1940年5月，国民党伪县长李本清带领地方反动武装，进攻我农村抗日根据地，占领学校、逮捕老师、抢掠财物、烧毁学校村庄，我党领导农民进行武装自卫，他全

力支援和参加这场武装斗争，表现非常勇敢坚决。他曾和何世权、许家骅等人，趁着黑夜，袭扰盘踞大成圩上的敌人，进行火线喊话；在包围盘踞东馆小学的多蕉，石康的自卫团的战斗中，他亲自率领一部农民武装，从学校后山袭扰反击敌人。他还经常来指挥部找张世聪、何世权等人，提出许多打击敌人的主意，勒鸡水伏击战，就是他提出的。为了支持这场武装斗争，他卖了一部份田地，购买枪弹，解决粮食供应。

朱玉光就是在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中，于1940年6-7月间，经张世聪介绍，县委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一再增兵进犯根据地，斗争非常残酷和艰苦，朱玉光跟着队伍不方便，便带少数人走村串户，宣传群众支持武装斗争。他走的地方，都是新地区，他成了开辟新区的先遣人员。1941年武装斗争停止后，他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但毫不动摇，继续革命串联活动，灵山南部和钦州东部都有他的足迹。他靠两门手艺，一是中医为人看病，二是青年时学过的“风水”，作为掩护，到处有人招待食宿，通行无阻。当然，在这十年间，他碰到不少敌军，多次死里逃生。

朱玉光在外边活动中，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他先后发动了不少人参加革命，壮大武装队伍。在1945年的谷埠事件中，他找到当地农民周亚石等，打捞掩埋落水牺牲的同志；他曾和钦县那彭周屋村朱敬亭（民主人士）一起营救被捕的钟古同志。

为了革命，他几乎倾家荡产，1945年以后，经常为部队筹饷筹粮，自己家里的，只要拿得出都捐献出来，还利用自己亲友和社会关系，为游击队借钱借粮，他的家实际上成为游击队后勤供应站。

他的两个儿子，小儿子朱菊清，在45年武装起义后被捕牺牲，大儿子朱兰清是合浦地方党政负责人，敌人多次悬赏捉拿，强迫朱玉光家要钱要物、没收田地，几乎把他的家产弄光。朱玉光为了革命，长期外出，田地没人耕种，临近解放前夕，他干脆把剩下的田产卖光，拿来还他经手借的“革命债”。

解放后，当地民兵在他率领下，把所有反动据点及地主武装的武器收缴了，同时大大加强民兵的战斗能力。在剿匪中，扫清从县城至张黄的匪患。1950年5月召开的县人民代表大会，朱玉光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

但在那时，合浦已刮起一股黑风，把刀子对着地下党和游击队。1952年土改时，大成的土改被叛徒朱万田和反革命分子朱老龙所操纵，一场阶级报复明目张胆地进行，把家破人亡的张世聪烈士家定为地主，没收追悼会各界送来的挽联；把朱玉光也划为地主，把他关押起来，煽动群众斗争他，可是群众坚决抵制，连大小会都开不成。

不白之冤对朱玉光刺激太大了，把自己所有一切献给革命的人，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激愤成疾。1954年7月进合浦医院治疗，当晚便吐血身亡，时年68岁。

朱玉光的家一直作为地主看待，55年春节，广西省老区慰问部团到了大成，听了群

众申诉，慎重查对，经浦北县人民政府批准，才定为“小土地出租者”。57年反地方主义时，又推翻这个决定，把他的儿子朱兰清定为“地主阶级代理人”，受到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职务处分。这宗冤案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后，组织上三次派人查对，证明朱玉光家七口人十四亩地，主要成员都长期在外工作，56年定为“小土地出租者”，是正确的、符合土改政策的。

朱玉光这一生，经历三个朝代，从自我奋斗到献身革命。他最后十多年的革命生涯，是非常光彩的，合浦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以有这样的老战士为荣！尽管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极力诬蔑陷害地下党和游击队，想抹掉这段历史，那是枉费心机的。

包宗周（自传）

我是浦北县大成乡人（原属合浦县白石水乡），1908年出生在大成符竹大队山子尾树。世代以耕农为活，父母生下我姐弟四人，大姐出嫁到勾刀水村（即张世聪、张世柏的母亲），没有读过书，没有安上名字，勤俭持家，一心支持世聪闹革命。二哥包永福，遭受伪军袭击，在柴头坪牺牲。三哥包永禄，早已逝世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健在。

我八九岁时，去过养正学塾，读过六年私塾，以后就在家专责放牛、打柴、耕种和一些家务。当时我外甥张世聪经常来我家探望我父母亲，有时也同我一起牧牛、打柴，我俩年纪差不多，谈吐称心，甥舅很是契合，他每次来谈，我感到无限快乐。

1940年5月1日，张世聪在大成乡椏檬坳主持召开革命团练大会，也是抗日武装斗争誓师大会。那时，张世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脚穿草鞋，头戴竹笠，腰插驳壳枪，威风凛凛站在主席台上。参加大会的农民、工人、学生约二千多人，大部都带着枪来的。开会时，张世聪抽出驳壳枪朝天扣了三枪，大声呐喊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汪派汉奸卖国贼！打倒贪官污吏！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接着工人、农民、教师上台讲话，大家精神振奋，不断高呼口号。张世聪还带领大家饮血酒，提出同心同德，革命到底，一家有事，大家相帮，一村有事，大家相助……。

有一个晚上，世聪带着体宽和家祚（七叔）来我家，谈及要组织脱产的革命武装队伍。我提出要参加，他不出声，过一会他劝我说：“舅公，你不要露面，留在家做交通联络，收集情报。”我还是坚持要去，他说“在家和到外面，一样为革命工作，也许你在家比到外面对革命事业有利。”我只好听从了。

我家原有三枝步枪，我问爹妈说：“外甥要打反动派，急需枪弹，可否给他？”我爹妈听了，满口同意，哥嫂也都同意，我就把这三枝枪、几百发子弹交给了体宽和家祚。我妈还把她存的四元光银，也给了世聪。以后队伍缺粮时，我家尽力支持，朱兰清、陆新等人经常来我家联络，了解情况。

有一次，张世聪找我，想买短枪，我找包开良商量，决定到六湖垌找陈荔香打探，

陈荔香说有两支抓咀，搭2000子弹，要价二千元。枪是有了，但路途经过安石的大石麓饭铺，有冬防队十多人盘查来往客人。张世聪决心要买，找他叔父张金声筹足二千元给我，我和包开良再去六湖垌买了枪支，准备过安石时跟冬防队干一场，幸亏这些狗子不长眼，我们算是平安回到大成，把枪交给世聪时，讲到买枪经过，他哈哈大笑说：“干得好，革命胜利了忘不了你们的功劳。”

有一次，三角塘七叔找我去见世聪，世聪住在金街阁鸡窝，他要我带他和一些人到小江去，我们打扮成担盐老，顺利到了小江，分手时，世聪交了两支驳壳给我带回去收藏，后来交给陈明景了。

不久，陈明景来找我接头，他想找个落脚点，我家很红，介绍他到柴头坪吴世宦家，并且经常帮他接近进步群众和党员，千方百计开展工作。

我在家经常为部队收藏东西，有一次，因没有子弹，陈大哥和陆新交给我一支水龙机关枪给我保存，又一次，涂团长交了一台电台给我保存，我都胜利完成任务。

1945年旧历二月，驻平山坡的伪军，化装我游击队到柴头坪，要饭吃，要找张世聪，我看样子不对，通知在场接待的人逃走，结果被伪军打死八人，其中有我哥包永福和包开良，只有我一个人逃脱，但也负了伤。

1948年旧历三月，党派我到北海了解情况，我化装成山货客到北海，被特务发觉逮捕，把我捆绑起来，用汽车押送廉州，我知道反正是一死，当车到中站，我见两旁树林茂密，便一跃从窗口跳下，绳索也断了，我拼命逃跑，终于逃脱了。事后，人家说：“包宗周你跳车逃脱，真是险过剃头。”

四十多年光阴过去了，我这个堡垒户是久历风霜，饱经患难，十年浩劫中，还给那些四脚扣上“叛徒”帽子。党的三中全会后，总算恢复我本来面目，我对党中央充满感激之情，正是：

遥望北京红旗展，
犹闻世聪号角鸣。

岑运彬 (1912-1968)

岑运彬生前是合浦县著名的内科医生，字苏民，合浦县廉州镇石桥街人。

生于1912年，父亲岑麟祥是个中医生。他家里因兄弟姐妹多，生活并不富裕。1918年他六岁时开始读书，24年在合浦县第二高小毕业，考入广东省立第十一中学（今廉州中学）。他上高中后曾兼任初中部英语教员。他在中学时代，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对旧社会不满，同情劳苦大众；具有很强的反封建、反压迫的思想意识，积极参加反对复古教育的学潮，并曾抗婚逃跑，以反对封建包办婚

1930年，岑运彬高中毕业，次年考入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因家庭经济困难，

他为坚持学业，曾兼任广州市知用中学卫生教员。在读大学期间，多与张进焯等一批进步同学接触，思想倾向革命。3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学院医学系，获得学士学位，被留校任皮肤花柳科助教、科主任。他曾热情资助过一批同学北上延安参加革命。

“七·七”事变，国难当头，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宣言，主张团结抗日。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辞去科主任之职，参加战地救护队，奔赴前线为抗日将士服务，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后来他被编入国民党军队任军医。

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使他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面目，于次年二月毅然弃职回乡，受聘任合浦县医院院长。其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合浦地区，他利用自己的职业、地位的条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合浦地下党的领导黄其江、阮明等同志。因此，他被当局视为嫌疑而受传讯警告，并遭到医院董事长的训斥，他便离开医院自办诊所谋生。后来，他曾通过地下党员岑焕祥的关系，向合灵地区游击队赠送了不少药品。

1948年初，他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民革合浦分会的组织下开展反蒋爱国活动。民革合浦分会按照蔡廷锴先生的布置，秘密组织武装队伍，成立民革广东省合钦灵防人民自卫军指挥部，由王宗兴、岑嘉贤和岑运彬等四人组成核心小组，他任政治部主任兼军医处长。指挥部决定于同年8月13日武装起义，因叛徒叶其润出卖，岑运彬等十一人被捕，国民党当局把他们视为要犯，押解至广州秘密监狱囚禁。广州解放前夕，反动当局又把他们转解往海南岛，途中寄押于新会县看守所。幸有难友中一人过去是看守所所长的上司，关系密切，经对该所长说服教育，晓以大义，全体难友终获释放。

解放后，他任广东省卫生厅保健科长。51年秋，他应钦廉专署副专员陈任生、合浦县委书记沈汉英和县长朱兰清的邀请，放弃了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优越环境，回乡为桑梓服务。他先后任合浦卫生院副院长兼广西第八医士学校副校长，钦州专区护理人员训练班班主任、中医进修班班主任，钦州专区人民医院秘书、内科主任，合浦专区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合浦医专教务主任，合浦县人民医院内科主任等职，并曾连续当选为合浦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常委。他长期战斗在卫生战线，为钦州地区、合浦县的卫生科学事业做出了重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打成合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后又被诬为“日本汉奸”，被揪斗强迫劳动。68年4月，合浦乱杀人之风四起，他的亲友和老伴曾劝他暂时躲避一下，但他总认为自己的问题明明白白，组织上也清清楚楚，应当相信党，经得起任何考验，因而坚持在传染病房劳动。岂料，厄运已降临他的头上。四月二十一日，他惨死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乱棍之下。终年五十六岁。

王宗炎

他是全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名教授。他的知识学问，是乡亲们交口称誉的，他的成就使珠乡生辉。

王宗炎，广西合浦县廉州镇玳屯坊人。1913年生，出身于县城望族，自小刻苦攻读，勤奋好学。1924至1928年在廉州中学读书；1928至1934年在广州中山大学预科和本科（英文系）读书。1934年至1944任公务员、报馆编辑、海关关员。1944年至1946年任廉州中学教员。1946年至1970年任中山大学外语系讲师、副教授。1970年至1978年任广州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教授。1979年回中山大学任教授。

1946年至1953年，王宗炎在教学之余，担任上海美商《密勒氏评论报》的特约驻穗通讯员，发表了几十篇英文通讯。

由1984年起，王宗炎与许国璋共同主编《现代语言学丛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他还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编委会，这一卷计划在1986年出版。

1984年，王宗炎主译的《光荣与梦想》第一册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科研二等奖。

王宗炎在教学和翻译著述很有成就，自己却很谦虚。他说自己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既想治学，又想做官。1938年经过两次失业，绝意仕进，只想找个饭碗，读一点书。1944年以后，更是不断用功，但他却自认为“成绩微乎其微”。他那些内容较为充实的作品，主要是1977年后搞出来的。他在高等学校讲课近四十年，颇有好评，但是他却感到自己对国家、对社会有许多未尽的责任。

王宗炎爱好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新闻学、翻译学和语言教学。由于工作需要，他由文学教学和写作教学逐渐转向语言研究。他认为语言研究应和文学研究密切结合，书面语研究和口语研究密切结合。他觉得，语言学家，既有科学家的头脑，又应有艺术家的气质。

王宗炎主编的《英语语法入门》等三种英语自学书，行销了几十万册，但他并不认为是学术著作。他始终坚持两项原则：一是独立思考，不要处处沿袭外国人的说法；二是材料要好好选择，力求对中国人有用。

王宗炎对英语有很深的研究，写的文章很有见地，既讲词汇意义和语法特点，又讲感情色彩和文章风格，这是很有见地的。

王宗炎长期教翻译，自己也译过书。在中国的译者中，他赞赏吕叔湘和齐沛合；在翻译理论家中，他推崇赵元任。他自己的翻译经验，主要见他写的《求知录》中。

在语言学方面，他欣赏赵元任、王力、吕叔湘、林语堂的某些著作和英国的伦敦

学派、捷克的布拉格学派的某些理论，而与美国的结构主义派和转换语法派相去较远。他写过一些对国外书报的评论，发表自己独立思考的意见。

王宗炎的精力主要用于英语教学和英语研究，自谦对汉语问题探索不深。五十年代，他评论过黎锦熙、刘世儒合著的《中国语法教材》，参加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

近几年来，他对《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吕叔湘的《语文常谈》和陈原的《社会语言学》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王宗炎一向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但是经过长期考虑之后，他嘲笑自己的鲁莽，现在他认为汉字废除不得。他说，理由很多，最主要的是解放后一切档案和科技资料都用汉字写，一改用拼音文字，这些东西非经翻译就无人能懂。况且汉字输入计算机问题现在已经解决，更没有废除汉字的必要了。

我们合浦人都知道，合浦出了两位语言学家，一位是岑麟祥，一位是王宗炎，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贡献。对王宗炎的英语造诣，外行人也津津乐道，说王宗炎能找出《牛津英语大字典》的缺点和毛病，真是了不得。

王宗炎的著译，除散见各报刊单篇文章之外，有如下各

1. 《亚当·密茨凯维文传》，译本，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2. 主编三种英语自学丛书（《英语语法入门》、《英语动词》、《英语语法图解》），1959年至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3. 《光荣与梦想》（美国现代史）第一册，译本，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4. 《回春楼谈英语》，论文集，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5. 《语言问题探索》，论文集，1985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宗炎是中国语言学会第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1984年任广东外语学会副会长。他还是广东第四、第五届政协委员。

由于职务关系，王宗炎还不能专心从事他所喜爱的项目：汉英语对比研究，他希望在今后的岁月里，搞出更多研究成果来。

邹瑜

邹瑜，原名邹优瑜。1920年10月4日出生于广西博白县龙潭区久福村，这个村是博白、合浦、廉江三县连接点，村前是合浦，村后是博白，三县的亲戚朋友很多，分不清什么广东广西。

从1932年到1937年底，邹瑜在合浦读书，也在这里接受革命启蒙教育。1935年夏，他在合浦县立第五中学（现在的合浦公馆中学）初中班毕业。秋天，他考入合浦县省立廉州中学高中部读书，他在何世权、何承蔚、吴裕春（辛莽）影响帮助下，参加了廉中学生进步组织“艺宫学术研究会”和秘密读书会，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及进步报刊，

从事革命的学术活动，他是廉中学生中后起之秀，是革命进步活动的积极分子。

1938年春，他和吴裕春（辛莽）、李辛农（廉东）冲破重重障阻，走过万水千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陕北公学学习，在这时期，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陕公结业后，他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1939年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科长。邹瑜在这个部门，从事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保卫边区的重要工作。

1942年到1944年，邹瑜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提高。1946年夏，党派他到东北工作，这是一场龙虎斗，是很好锻炼提高的机会。1946年冬，他担任哈尔滨市香坊公安分局局长，1947年，他担任松江省委双城工作队队长，同时任中共松江省委社会部科长，1948年担任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1949年受党的派遣南下广东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潮汕地委常委、社会部长，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汕头市公安局局长，中共汕头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汕头市警备区副司令员。

1952年8月，调任粤西区党委委员，粤西区公安局长，1953年任中共粤西区党委副书记。1954年底调任广东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党组副书记。1956年任中共广东省委政法部副部长。1957年底任中共汕头地委第二书记兼汕头行政公署专员。1961年底任汕头地委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62年兼任人民解放军汕头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在1966年冬至1971年末的“文革”动乱中，邹瑜被批斗，备受迫害，甚至把他到延安学习也成为罪状。

1972年初，邹瑜出任湛江地委常务副书记，同年任湛江地委书记。

1977年调广东省委，任常务委员，同年入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1978年任国家地震局局长，党组书记，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

1980年邹瑜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1982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第一副部长，1983年被任命为司法部长。他还是法学家，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邹瑜同志参加革命活动，已有半个世纪，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国家领导人，他把合浦作为第二故乡，革命的起跑点，我们认为有必要把他的情况向珠乡人民介绍。

林施均

三十年代，他在北海中学就是一位诗人，党培养他成为教育家、党务工作者，但业余还是一位诗人……

林施均，原名林树棠，笔名施鏊。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锦山区莲塘村人。生于1918年11月3日。他的父亲在北海镇经商，因此，林施均在1932年来到北海，从此北海成

为他第二故乡，他的革命脚步，是在北海迈开的。

1933年夏天，林施均考入合浦第一中学（即北海中学）初中读书。在北中，他和庞文隽（庞自）、何国达、吴世光、岑家毅、张家保、刘禹蟠等同学很要好，他自己也喜欢文学，常读些文学和历史书籍。由于和庞文隽、何国达来往较多，结识了何醒予大姐，因此，不久就参加了他们的静励斋读书会，接受革命思想。他除了读些中外进步文学名著外，还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如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何上肇的《政治经济学》等。同时还读了当时出版的进步杂志，如《生活》、《世界知识》、《新生》、《农村经济》、《太白》、《译文》、《北斗》等，思想日益进步。

当时，林施均还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活动，进步同学赵世尧、苏觉民负责学生会工作，苏觉民主编《缪丝》刊物，林施均经常为《缪丝》写新诗及小品文，被同学誉为“诗人”，“诗人林树棠”在当时北中同学中，几乎无人不知。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传到北海，林施均积极参加全校反通考、反读经、反军训的斗争，为第二故乡的进步而奋斗。

1936年秋，林施均到了广州，考入教忠中学高中读书，参加该校进步读书会活动，他发起筹建合浦同乡会。这时候，广州学生的抗日进步活动很活跃，林施均和赵世尧、刘禹蟠一起，到中大附中夜校学世界语，自己也组织拉丁化新文字活动，写出了“琼崖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后来，受中山大学进步同学杜渐蓬的委托，准备筹办合浦同学会，后因学校阻止未成。

1936年底以后，林施均同苏觉民一起，参加温流、黄宁婴、陈芦荻、陈残云等人组织的广东文艺界抗敌协会诗歌组活动，并在《广州诗坛》上用施鏊的笔名发表新诗，成为《广州诗坛》（后改为《中国诗坛》）的第一批诗人。在发展新诗歌运动中，同苏觉民、何承蔚以及广州其他进步诗人一道，跟“现代派”“唯美派”诗人李金发等作斗争。

1937年9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施均回到北海，参加当时的北海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曾同吴世光、刘雨帆（禹蟠）、庞文隽、何国达、何正三等一起，创办《战声》三日刊，并编文艺副刊。这时，他发表了一首《保卫北海，我的第二故乡》的新诗，这是一首艺术水平较高的诗，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同时，他还参加开办“世界语学习班”，担任教师。

1938年初，林施均回到海南岛海口市，参加了中山大学学生林耀鏊组织的“广州中大琼籍学生回乡工作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编辑海口《国光日报》副刊，发表不少抗日诗歌。

1938年5月，林施均经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考入抗日军政大学，开始新的革命工作。经过短期学习之后，便留校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胜

利。解放战争时期，林施均在八路军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担任过政治沼教员，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科长等职务，受到很好的教育和锻炼。

1950年，林施均从军队转业地方，回到第二故乡工作，担任钦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专署副专员。1954年转到工业战线，调到武汉，担任武汉钢铁公司党委宣传部长、炼钢厂党委书记。

1958年，他担任武汉钢铁学院党委副书记。从此以后，他转到教育战线，负责高等教育的领导工作。从1963年到1983年的20年间，先后担任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78年至1980年间由冶金部派往云南昆明工学院，担任工作组组长，负责整顿昆明工学院，曾代理昆明工学院

林施均算是个幸运儿，在40多年革命生涯中遭到波折比较少，原因大约是：（一）1938年去了延安，和地下党牵扯比较少；（二）解放后虽回到合浦工作，但很快就离开这个“左家庄”了；（三）他负责的工作需要专业知识学问，别人想排斥他也进不了门。

1983年9月，林施均做了一件好事。海南岛解放了，多年了，连一间大学也没有，从领导到群众，都要求创办海南大学。应海南区党委聘请，由中央教育部派遣林施均到海南岛海口市，创办海南大学，他担任党委书记。经过一年多艰苦奋战，海南大学已初具规模，已开始招生，已有本科和专科生2000余人，教职员工1400余人。

在办学之余，林施均还在写诗，在海南大学，他和各方面诗歌爱好者一起，建立了海南诗社，连李英敏这个半个海南人，也拉了进去，出了几期诗刊。现将林施均近作诗一首附后。

钦廉行组诗选三首

（一）

六万大山旗万千，
燎原火映合浦天，
十年喋血谱史牒，
后辈奋勇续新篇。

（二）

廉江绕郭入海流，
珠色风光一览收；
满目青山春色漫，
故城新貌壮神州。

（三）

初升旭日映天红，
北海劲吹振兴风，

大展宏图今胜昔，
内联外引建新功。

1985年2月

黄平

他是在外省工作时间较长的负责同志。他走过一段坎坷的道路……

黄平，原名黄燕帆，原籍是合浦县土东乡（现属浦北县寨圩镇土东村）。1919年旧历正月，他出生在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土东乡当时是全县文化最落后的地区，他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塾度过，由叔父当塾师，全年无假日，好处是多认得几个字，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就在这里看过。

他的家乡靠近广西横县，因此就到横县读初中，这时开始接触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人的小说读了不少，影响较深是丁玲的《水》（北斗杂志），他曾试写小说，在校刊上发表。

他向往进步，向往革命，但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是在1936年，他到广州进了省立勳勤大学附中，得到同乡、中山大学的学生卢璧光、陈铭炎等人的帮助，那时他和横中的同学古世铭同住一间学生公寓里，卢、陈几乎每个周末都来辅导学习政治经济学等书籍，并且跟他们讲述党对时局的主张。

“西安事变”前后，他和古世铭与广州市学联取得联系，并在各自的学校的同班同学里组织读书会。根据卢璧光陈铭炎的指导，驳斥托派散布的“放蒋是阿Q”，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7年下半年，黄平在桂林高中借读，和杨烈、黄嘉等同班，那时全国抗战开始了，学生们上课都无心听讲，经常阅读抗战书刊，热烈地展开讨论，寒假时到兴安县作抗日宣传。为了如何抗日，他和同学们讨论到深夜，结论是积极找党去。

1938年春，黄平回到家乡，知道卢璧光已回到寨圩，在合浦简易师范（后改为合浦七中）任教导主任，他向卢提出入党要求，卢答应帮助他解决，并介绍他在简师任“代用教员”，主要帮助学生搞抗日先锋队的宣传工作。

就在这一年，黄平经卢璧光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教员里还有陈业昌（支部书记）和粟稔（曾参加合浦中心县委），他们合编在一个党小组。

1939年7月，黄平离开家乡到桂林，和粟稔联系上，曾到宾阳前线搞战地服务工作。日寇退出广西后，粟稔介绍他到广西地方干部学校（这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里面有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名义上黄旭初当校长，实际上由教育长杨东莼负责）任指导员，后调梧州分校，仍任指导员。

1941年8月，黄平到贵州遵义，进浙江大学读书，1943年转到昆明西南联大就读。

1944年初，黄平曾到滇南，任私立磨黑中学校长，后任滇东陆良中学教师。1946年调回昆明，在云南大学附中任教，同时参加地下党昆明市工委（三人小组）。1947年底，党派黄平到滇西，曾任滇西工委书记，领导一支游击队。1949年7月，滇桂黔边区党委成立并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黄平是区党委候补委员、滇西北地委书记，边纵7支队司令员兼政委。

1950年3月，云南全省解放，黄平曾任保山地委第二书记、专员。后调省里，先后担任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省卫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並参加省人委党组。

1958年，在所谓深挖地方主义中，黄平被诬为反党集团骨干，最后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降为会泽矿山跃进坑副坑长，建筑公司工区副主任。“文革”中，放到一个木工小组当木工，监督劳动。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平的问题得到改正，被任命为昆明医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1982年底被选为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改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黄国栋

他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教育家，他走过一条艰苦学习的道路。

黄国栋，广西合浦县廉州镇人，1920年11月11日出生于县城。幼年丧父，母子寄居外祖父姚玉书家，外祖父是个小店员，家境贫苦，因此，黄国栋母子的日子十分艰难，靠点手工艺维持生活。

1932年至1938年，他在廉州中学读书，完成初中、高中学业。在廉中读书时，参加“艺宫学术研究会”的活动，在杜渐蓬、何世权、何承蔚等同学影响下，阅读进步书刊，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积极参加歌咏队、演剧队的活动，是主要骨干、积极分子。

1938年毕业后，受进步同学影响，决心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但到了广州不久，原来答应在经济上支援他往延安的同学，改变了主意，自己又没有路费北上，正是进退两难。当时广州已经很混乱，敌机不断轰炸，市区已动员疏散撤退，幸好得到同乡同学的帮助，在广州沦陷前一天晚上，离开广州回到合浦。

在县里这段时间，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进步活动，1938年冬，考入国民党广西军175师政治部的宣传队，里面有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人士，做了一些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9年冬，钦州、南宁相继沦陷，合浦很紧张，175师已撤退，经友人帮助，投考重庆的“音乐干部训练班”学习音乐专业。1943年初，该班改为国立音乐分院，后转到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本院理论作曲专业学习，1945年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

从1945年到1950年，他在重庆、南京国立音乐院任教，长期从事高等学院的音乐教育工作。

1950年以后，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先在天津，后迁北京）任教，还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音乐干部进修班主任，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支部书记，党委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系主任，《学报》编委、学术委员。

黄国栋长期在党领导影响下工作，在廉中时，他是我们党外围积极分子，正待解决他的入党问题时，因生活和上学问题他离开了合浦。1949年初，他在南京找到了地下党组织，经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介绍，填了申请书，未及举行仪式，南京就解放了。直至1953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时，经刘恒之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黄国栋教学之余，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和社会职务：

1945年任中国音乐社社长。同年应陶行知先生之约，筹办重庆星海合唱团，担任副主任（陶行知先生是主任）

1947年初，担任南京合唱团团长兼指挥。

1953年被聘请为国务院出国留学生考委会音乐类主考委员。

1957年以后，曾多次被派出国交流访问。

1945年起，主要从事音乐教育工作，也写了一些作品，均毁于“文革”中，近从私人手中找回仅四首抒情歌曲，《放一朵玫瑰花在你的窗前》、《星夜》、《祖国我的母亲》、《我爱那初夏的红花》，是当时音乐会中较常用的歌曲，没有正式出版。

黄国栋写过的作品有：

抒情歌曲十二首

钢琴曲：小品三首、组曲一首、舞曲三首、奏鸣曲一部、序曲和赋格八首

弦乐四重奏一部

小提琴独奏曲一首

大合唱 渡江（为解放南京而作）

教材方面有：多声部听写集 50首

教学法手稿 一部

黄国栋现已不担任领导工作，专心从事音乐基础技术理论专业教学。

伍雍谊

他是全国著名音乐家，音乐理论家。他是我们合浦老一辈从事音乐工作的专家之一，现在仍然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领导人之一。

伍雍谊，广西合浦县高德镇人（现属北海市），1921年4月20日出生。他的父亲伍瑞锴，是合浦很有学问的教育家，担任过廉州中学校长，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杜渐蓬、何世权、何承蔚、罗文洪等，都是他的得意学生。他的子女，大部分参加革命，

大女儿伍雍娴，儿子伍雍谊、伍雍瑾等，都是合浦地下党的党员，是骨干积极分子，伍瑞锴这个家庭是很有意思的。

伍雍谊是在合浦县城读廉州中学，1940年在廉中高中毕业。他在廉中读书时，受进步同学影响，参加“艺宫”的活动，读了不少马列主义和革命书刊，积极参加抗日进步活动，他特别喜欢音乐，和张文纲、黄国栋等，都是廉中歌咏队的骨干。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在廉中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是廉中党组织的骨干积极分子，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1940年他在廉中毕业后不久，党组织根据隐蔽精干，长期积蓄力量的方针，决定让他外出升学。1941年夏天，他到重庆学习音乐。1946年，他在国立音乐院作曲系毕业。

从1946年8月至1950年2月，他当了一段时间教师。其中有广东省立艺专任助教，四川省立北碚师范学校音乐科教师，重庆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科讲师等。

四川省解放后，他曾在重庆市人民政府文教局、文化局负责搞了一段时间行政工作。

1954年5月，他调到北京工作，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先后担任理论创作委员会秘书，《音乐创作》编辑，《人民音乐》编辑。

在“文革”中，他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

1973年10月至1977年，在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78年起，任《人民音乐》副主编。

1983年5月起，负责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理论委员会委员。仍任《人民音乐》副主编。

伍雍谊在国立音乐院读书时，和校内进步同学一起组织了学术团《山歌社》，从事收集、编印、研究、改编、演出民歌的工作。该社的宗旨是从整理、研究民歌出发，创造具有民族特点的音乐。《山歌社》发起的民歌运动，在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的音乐界及社会音乐生活中曾产生广泛的影响。他改编的绥远民歌《小路》，曾成为当时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

解放后，他在担任行政工作和编辑工作之余，积极从事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写作。

音乐作品中有歌曲《农民翻身谣》、《建设之歌》、《啊，起伏的山岗呀》等。弦乐四重奏《行板》等声乐、器乐作品20多首。

伍雍谊在音乐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自1950年以来，已发表音乐理论文章100多篇约60万字。其中音乐评论文章，在各个不同时期的音乐生活中，曾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评美国爵士音乐》（《人民音乐》1卷6期）一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美国爵士音乐的历史发展、艺术特点、社会作用进行分析评论。

对我国音乐工作者和广大音乐爱好者了解美国这一商品化音乐想象并进而认识美国社会生活是有帮助的。1959年，他在《人民音乐》第7期，发表《让音乐表演艺术的百花灿烂开放》一文，对当时片面强调音乐为当前政治服务，否定音乐遗产的思潮，文章联系实际，从理论上阐明了处理表演曲目问题的正确原则，坚持了马列主义正确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观点。该文在当时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又如近几年来，在音乐界曾产生迎合低级趣味，模仿西方商品化音乐的消极倾向，他曾先后发表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美》、《时代和美的关系及其他》、《新闻作风与乐风》（均见《人民音乐》上），提出了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创造我国新时代的音乐美的问题。他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商品化音乐在我国产生影响的原因，批评了追求商品化音乐的低级庸俗倾向。这种批评是很及时的。

在音乐艺术基本理论方面，他写了不少有见地有创新的文章，如《形象思维和音乐创作》、《标题音乐的题材处理和艺术表现》、《论音乐作品的阶级性》、《关于音乐的内容》等等，对音乐理论建设，作了新的贡献。

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伍雍谊的音乐作品和音乐理论，对我国的音乐界，会有更大的贡献。

谢童关

他是从廉中“艺宫”成员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他的经历是令人深思和学习的。

谢童关，原名谢有干，合浦南康黄稍村人，生于1919年夏天。

小时在黄稍读初小，在南康三中附小读高小。1932年秋考入广东省立廉州中学，读了三年初中。在廉州中学时，他年纪虽小，但十分喜欢老师讲的古文，如《卖炭翁》、《苛政猛于虎》、《桃花源记》等。特别是喜爱阅读进步书报和文艺书籍，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冰心的《寄小读者》。邹韬奋等办的《生活》周刊。艾思奇的《读书生活》及《文学月刊》等。在此同时，他在廉中进步同学杜渐蓬、何世权、何承蔚的影响和帮助下，和同班同学周崇和一起积极参加了“艺宫学术研究会”的活动，阅读进步书报，参加救亡活动。在“艺宫”版报上写了一些诗歌，宣传抗日救亡，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开始接受和学习马列主义通俗读物。

1935年秋考入广州八桂中学念了三年高中。在课余之后，经常到新民书店，上海杂志公司，阅读了更多的进步书刊和通俗的马列主义著作；《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我的大学》、《铁流》、《士敏土》、《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西行漫记》、《中国西北角》、《青年自学丛书》、《从东北到庶联》、《大众哲学》、《毛泽东传》、《朱德传》、《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新华日报》、《解放》、《群众》、《救亡日报》、《生活日报》、《中流》、《译文》、《世界知识》、《全民抗战》、《中国呼声》、

毛主席《论持久战》等等，使他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启发和教育。是他背叛地主家庭，追求真理走向革命到陕北去参加党的思想基础。

西南事变前在广州中山大学地下党的影响下和张佳兴（张向明，党员）同学一起参加了广州中大举办的世界语学习班学习，在1936年与高二班同学林弋（林克武），黄兆平同学一起在同学中组织读书会，在校开展救亡活动和学生工作。

抗战开始，广州大轰炸，八桂中学迁到广州郊区竹料，他和党员（张佳兴）等一起组织“八桂农村服务团”为郊区竹料农民开办墙报，宣传从路军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为八路军募捐防毒面具。组织歌咏宣传队，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武装保卫华南》等救亡歌曲。

总而言之，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他在中学期间得到进步组织和地下党的帮助，在马列主义和进步书籍的影响和熏陶下，在党的领导下走向革命到延安去。

1938年6月高中毕业后经广州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陕北公学关中分校二区队卅四队学习。同年十一月在陕北公学经丁农、田心、陈考达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陕北公学毕业后，组织上调他到中央青委办的安吴青训班速记班学习。1939年5月调到中央书记处秘书科速记股工作，参加了用速记记录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如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报告，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等1939年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华北敌后太行山去，经组织分配到北方局宣传部材料科工作，曾参加《材料汇编》的编辑工作。

1942年5月扫荡后到1947年夏先后任林北县委、磁县县委宣传部长，五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八年艰苦抗战，基本上在延安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渡过的，给他很大的锻炼和深刻的教育，这都是使他终身难忘的。解放战争时积极参加平汉、豫北战役的后勤工作。

1947年夏，从太行山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皖西桐城、潜山、怀宁三县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先后任桐、潜、怀工委书记，桐、潜县委副书记，潜山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

1949年3月潜山县解放后任潜山县委书记。1952年任安庆地委委员、地委、农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1954年大水任长江同马大堤防汛指挥部政治委员。1954年10月至“文革”前任合肥市委书记处书记，马鞍山市委书记处书记。1956年至1957年曾在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学习了一年多。多年来分工搞党群、农村、文教、钢铁工业等工作。

在反右派和十年动乱中，他遭受迫害，饱受折磨。至1972年才得“解放”始任安徽省马钢建设指挥部党组书记，副指挥，1977年调任马鞍山钢铁学院党委副书记。现经冶金部批准离休。写有大别山回忆录《战斗在崇山峻岭之中》刊登在《安徽党史资

料通讯》。

谭 流

谭流，原名谭连甲，一九二三年六月生于贵县木格社塘村。一九四〇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清末，社塘村出过一对父子举人，秀才十余人。在这样偏僻，近乎“蛮荒”的地方，居然父子中举，实属凤毛麟角。方圆数十里，社塘算有些名。一九二六年，中共梧州特委书记谭寿林被捕，谭流的父亲炯章赶赴梧州营救，出狱后，寿林到社塘进行革命活动，搞得热火朝天，社塘，谭冯两村的名声更大。一九二七年寿林在上海，负责党中央机关工作，并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炯章做他的联络员。一九三〇年中央派炯章回广西工作，介绍黄彰到社塘、谭冯秘密活动，后来黄彰长期住在社塘。谭流的家是地下党的联络站。因此，谭流从小就受到革命影响。一九三六年底，炯章带他来南宁，炯章是广西省委联络总站负责人，公开职业则是英发公司的经理。谭流在南宁初中读书，经常帮助父亲做交通联络。为便于工作，炯章利用中华电影院、光华大旅社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开秘密会议时，由谭流站岗放哨。可以说，他从小就受过相当严格的保密教育，完成过一定的任务。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飞机大肆轰炸南宁，一时南宁变成一个恐怖的城市，学校命令疏散，谭流转学回贵县中学。局势急转直下。党组织要他跟随族兄谭绍育参加学生军，但身体检查不合格，没有被录取。党组织介绍他参加秘密革命活动，卖《新华日报》、《解放》(周刊，延安出版)等党的报刊。第二年，渴望当职业革命，跑到南宁找谭留科(按辈份、属侄一辈)，因擅离学校被开除学籍。到南宁后，留科转移了，没有联系得上，敌机又乱轰炸，只好跑回家。回家的第二天，意外地见到了留科，高兴得不得了，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留科被派回贵县县委为领导人之一。留科要他回贵县中学读书，组织上通过好些社会关系，为他恢复了学籍。重新回到学校，正要安定下来，日本鬼子打到了南宁，家乡有沦陷的危险。留科组织了抗日游击大队，他认定要革命就必须参军，要求参加游击队。黄彰、留科都责令他继续留在学校读书，多学习些知识，以便更好地为革命服务。

一九四〇年三月，地下党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推动国民党政府组织贵县各界前线慰劳团，开赴合浦，灵山前线劳军。谭流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这个团，到了前线。百闻不如一见，看到了战场上的烽烟，也看到了劫后的惨象。

一九四一年一月，地下党组织谭流回家乡活动，担任社塘支部书记，编辑党的报纸。同年四月，担任木格中心支委宣传委员，仍兼任社塘支部书记。地下党组织认为谭流有升学条件，“皖南事变”之后，要“埋藏掩蔽”。谭流卖了几年党的报刊，不

宜再留本乡。决定给他继续升学。高中毕业后，到重庆考大学。不料，到重庆后两个月，广西就沦陷了。《新华日报》（南方局）的负责同志要他在复旦大学待下去，以学生身份搞学运。以整风精神自我教育，联系实际学习《整风文献》。一九四五年六月，桂东南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山城重庆时，他感到回广西困难很大，要求去延安，组织上坚决要他回广西。同年年底回到家乡。起义失败，家乡惨遭蹂躏，“杀人如草不闻声”。他的父亲刚刚从监狱中出来，满目疮痍。他迅速找到过去的党员，恢复和建立木格支部，担任书记。因起义失败，不宜在本乡工作，一九四六年三月，到合浦七中教书。四七年三月转到灵山、陆川。因绍育被捕，被迫从陆川撤退，去香港折回遂溪、廉江。一九四九年到六万山（合浦）地委，同年七月，筹建贵（贵县南部）兴（兴业）县工委，担任书记。五〇年六月从湛江调回广西，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现任广西文联党组副书记。

在前进的道路上，谭流走的，极为坎坷。广西地下党受迫害，在谭流的身上看得很清楚。他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一解放就受到严重歧视。游击队编入军分区后，一队员无故被监禁，几天就死于狱中。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开始剿匪反霸，两名党员被枪毙。其中一名是一九三八年的老党员。他的父亲，地下党组织安排他进贵县三青团担任书记。一九五〇年八月，被定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一九五一年元月被捕，一九五二年三月被处决。受株连的党员、干部、群众数十人。他的一个弟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原来就患有心脏病，在下放劳动中恶化致死。最小的一个弟弟在师范学院数学系读书，被开除学籍，送回家劳动，引起精神分裂症而致死。谭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地向领导谈了炯章的情况被批斗围攻。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谭流向党交心，说了炯章的真实情况，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九六三年“洗温水澡运动”，谭流反映了地下党、游击队，受到歧视，受到迫害，被定为反党分子。报上去了，但没有批下来。“文革”期间，谭流受到的迫害，象在煤火上撒了一把盐。有人说是“杀父之仇”，哥哥又在台湾（一九四五年九月首批出台湾）等等。这就可以什么都有了。三次被抓，几乎打死，戴过手铐，被关被流放达十一年之久。

对这一切，谭流坚定认为，党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指导，一定能明辨是非。现在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炯章的冤案已经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党龄从一九二九年六月在上海入党时算起，恢复名誉。受株连的同志、群众、家属的问题，都已解决。

谭流从小喜爱文艺。炯章跟他讲寿林的故事，说寿林也是个文学家，笔名晏殊，著有《俘虏的生还》等书，还讲了小说中的一些故事情节。他听了感到原来搞文学要讲真话。一九四〇年全省中学征文比赛，他以题为《蝉》的一首诗获“技艺优胜奖”。这个诗歌颂“从胸臆中发出呼喊”。同时在两个报刊上发表了作品。黄彰鼓励他学文艺，

委以党报编辑责任。在复旦大学，为“榴红”文学社发起人之一。一九四七年在香港几家报刊发表了小说、通讯、诗歌、杂文等。参加党领导的“香港诗人音乐家协会”。一九五一年担任半月刊《宣传员讲本》主编，一九五三年担任《广西文艺》主编。以后担任过广播电台总编辑和广西电影制片厂厂长。一九八〇年恢复工作后，担任《广西文学》总编辑。建国来，谭流一直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写的东西很少，尽管这样，他还是以写文章“获罪”。他写的《“本大人曾经此苦”》，险些被划为右派言论；《祸从日出吗？》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文革”开始，谭流的《北山絮语》（《鸳江日报》专栏文章，三十多篇）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谭流变成为“南方的邓拓”。难怪同志们说，谭流的作品不多，但有棱有角，触动“左”倾机会主义的神经太厉害，因此总是挨打有份。最滑稽的是，谭流写的短篇小说《粮食问题》还没发表，就拿来大批判，有个同志开玩笑，这是“未发文章已碰头”。

罗绍周

罗绍周，写作时曾用笔名钺倭、爱华。1918年中秋节翌日，生于北海市郊。祖辈是农民，从电白县林头墟迁北海定居，父母亲从童工到鞋匠，文盲。他学龄期曾念教会学校，1928年就读北海市第二区女子小学五年级，1930年小学毕业考入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初中，在校受冯道先老师影响，常到绿波书社看书。日本侵略东北，他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从事示威游行、宣传、演剧、抵制日货等。和赵世尧、苏觉民、王文崐等人很要好。1933年初中毕业后考入高中普通科，和赵世尧、苏觉民同班。当年赵世尧从广州回到北海，送给他一套理化试验仪器、几本辛垦书店的译著，还借给《自然辩证法》等书。他两人经常互访并留宿在家畅谈。赵对他的学习和思想影响很大，使他从爱国主义逐渐接受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在中学时期的主要活动有：

(1)和赵世尧等人在合浦一中组织新哲学研究会，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广泛团结青年，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2)和赵世尧、苏觉民等人，多年受到合浦一中同学的爱戴，被选任学生会主席团、常务干事等，领导学生运动。他们还和廉州中学何世权（李英敏）、何承蔚等人的艺宫派密切联系，互相学习，共同促进学生爱国活动。当年的积极分子有庞文隽（庞自）、何醒予、林朗天、吴世光、张文纲、林树棠（林施均）等。

(3)适应合浦一中学生要求进步，反对落后的愿望，和赵世尧、苏觉民等人领导全体同学用“静坐怠课”、“考试交白卷”等方式反对教育当局和学校“读经、复古”的反动措施。

(4)为了团结进步同学，宣传抗日救国，和王尚业在北海市三小创办“培根夜校”，并争取合浦一中校长同意，保送五名成绩优异的学生免试直升初中。

(5)合浦一中训育主任马斋心狂妄跋扈，镇压学生，作风下流，激起全校公愤。在学期结束后，全校学生分成三路，由他和赵世尧、苏觉民分领，用示威驱送方式逐马离校。马秘密潜逃到海滩，未及上艇，学生已赶到，双方对峙，马当场拔出手枪，并指使雇佣的打手排成阵势，气势凶狠地威胁学生；他领的一队及时赶到，面对强暴，不慌不忙，把他准备的冥镪香烛，在沙滩对马燃烧起来，领导全体学生高呼口号，形成逐瘟神阵容，人心为之大震，马在群众声讨中灰溜溜上艇逃走。

1936年广州“荔湾惨案”后，就读中山大学的冯道先同志在9月牺牲，他却在这时考入中山大学。当时蒋介石夺取广东省的领导权，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更为尖锐激烈。他入学不久，便结识地下党人李家鼎，李向他传送党的文件资料，并发展他在夜间到石牌、长湔等乡村参加农讲活动。他也和陈任生参加广州合浦留省学会的活动，他和张世聪被选任一个组的负责人。

中山大学迁到云南澄江，由于师生不满学校的腐败统治，于1940年初爆发“倒萧运动”，他成为理学院领导学生运动的代表参加斗争，取得了胜利。同年夏季他毕业，授理学士学位。因当时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出于“科学救国”的单纯观点，投身万县伪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工作一年多，看到处方反动腐败，便主动离处。以后回到桂林，受文联左翼人士的推荐，和王修平等结队到广西横县鳌山中学任教，在校不久，校董会籍口王修平左倾受解聘，他转移到合浦小江镇正成中学任教，先后在粤桂边区中学任教多年，支持和掩护学生的革命爱国活动。曾收容六万山区支前司令都的人员从事筹款购置等，曾星夜带领蒋军残部低级军官罗正安等脱离伪军，遭到蒋军包围北海文明路要搜捕他，幸被居民掩护逃走。随后在粤桂边区纵队第四支队参军，解放北海时被派充南下大军作响导领入市区巷战。随边纵四支进市后，在北海军政委员会工作，曾被派带领一个小分队到四野民运部参加支前解放海南岛。谢王岗同志主张他在解放海南岛后去搞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所以他参加北海市热烈庆祝五一节和胜利解放海南岛的翌日，便离别北海军政委员会转移到东北。

他一到抚顺，便被派领导铝氧研制。用很快的速度，在1950年底研制碱烧结法制取铝氧工业试验成功，并制取了批量产品，为新中国炼铝工业迈出可喜的第一步。这种方法切合我国铝矿石的特性，至今仍被工业生产沿用。他在东北还参加工厂设计和教学工作，他的学生遍布全国铝厂和科研单位。他的科研成果也被实用和受到冶金部奖励。1956年他被调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从事一些尖端材料的研制，也取得好成绩。因此，在1958上半年，朱德委员长亲自到他的试验室视察工作和接见他。1963年他虽已调到包头冶金研究所工作两年，仍受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转给冶金部颁发的科研一等奖。在包头从事建设研究所和国内重点的白云鄂博矿科研工作。“文革”期间，他同样受到迫害和折磨。因为对他是诬蔑构罪，他始终不服，不断上告，终于

“四人帮”垮台，获得彻底平反。迎来科学的春天后，他的科研成就，先后受到包钢公司、包头市委、市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区人民政府的奖励。

1980年初被调到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工作，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授予他高级工程师证书，还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得偿多年宿愿，一九八五年受聘为顾问。自许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愿为党为人民事业，为祖国“四化”，振兴中华，继续拼发微光余热。

陈贻芳

陈贻芳于1924年6月3日出生在广东省合浦县石康镇（现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

他生长在一个商业兼有少量土地出租的家庭，一家二十多口人，全靠父亲经商获利维持生活。到解放前几年，因纸币日益贬值，物价飞涨，商业不景，家庭经济濒临崩溃，他父亲依靠亲友资助合伙经营帮口生意，勉强维持全家生活。祖父和嫡祖母早逝。父亲是独生子，只读过几年私塾，十多岁就跟随祖父做小生意，肩负全家生活重担，后来他先后在石康镇上兼任过伪商会主席、伪镇长等职。后祖母和母亲都是文盲，两个嫂嫂文化很低，她们都在家中操持家务。大概是父亲感到自己文化低，没有出息，又受人欺负，希望后代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但由于他的重男轻女的偏见，姐姐在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妹妹也只能读完高中，而陈贻芳和两个哥哥，在解放前都受过高等教育，弟弟在解放后也进修达到大专文化程度，但他们兄弟四人、姐妹两人的志向和所选择的道路就不同了。

1930年春，陈贻芳未满六岁时，父亲送他入镇上一间私塾启蒙。两年后，于1932年春入石康镇第三区立第一小学初小二年级，1934年夏在该校初小毕业后考入合浦县城的省立廉州中学附小高小五年级，1936年夏在该校高小毕业。

他将近高小毕业时，因二哥参与驱逐反动校长范公镇的学潮，二哥怕他受牵牵连，不准他报考廉中，于是他在高小毕业后考入合浦县立一中（即现在的北海中学）初中部一年级。

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多地区相继沦陷。国难当头，匹夫有责。1938年秋，他和许多同学参加了学校进步师生组织领导的“合浦一中抗日先锋队”。是年冬，他到小江长塘山合浦一中分校继续读书。在长塘山分校期间，学习、生活都有一番新的景象，集体化的生活；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关心、爱护；课余或晚上到附近农村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高唱抗日歌曲；学习上除学好规定的课程外，有时组织同学学习讨论《新华日报》的有关文章和消息。在这里懂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1939年春，他回家渡寒假期间，也参加“石康镇抗日先锋队”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9年夏初中毕业后，考入合浦县城附近的“合浦县立一中大石屯分校”高中部一年级。次年暑假期间，学校通知撤销各地分校，并在合浦县城近郊平田村的李氏祠堂建校继续上课。1942年7月，他在该校高中毕业。

在毕业就是失业的旧社会，就业是个大难题，当时学社会科学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没有人事关系，没有后台老板，只能潦倒一生。特别是他不愿涉身政界，更不愿与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同流合污，于是便选择了攻读理工科的道路，自认有一技之长，将来可为祖国振兴工业做些工作，退一步说，谋求一个中学的数理化教席也易解决。1942年冬，他入桂林市近郊大埠乡的“广西大学先修班”学习数、理、化和英语，为以后攻读大学理工科打下牢固的基础。

1943年秋，陈贻芳考入国立广西大学理工学院矿冶工程学系一年级。第二年回乡渡暑假后，因日寇侵桂林，交通梗阻，他便休学并在石康镇的合浦县立六中任教。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到柳州市附近鹧鸪江的广西大学新设校址复学。

由于鹧鸪江校址条件很差，许多厂房破烂不堪，学习、工作、生活环境都十分艰苦。1946年春，由何康（现任农牧渔业部部长）、何祺中等学生会领导人发起了“返梧运动”（即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当局同意将西大迁返梧州市蝴蝶山老校址上课）学潮，组织许多同学步行到柳州市示威游行，并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当局请愿。他参加了这次活动。1946年暑假开始，西大从鹧鸪江迁至桂林市近郊将军桥新校址复课。

正当全国人民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政府倒行逆施，疯狂发动内战，屠杀革命人民群众，镇压学生运动，全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时候，1947年6月2日，他参加了由西大进步师生组织的、在桂林市举行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示威大游行。

这是他在西大读书期间，出于同情和正义感，自愿参加的两次规模较大的学生运动的活动。

1948年7月，他在西大矿冶系本科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他不愿到伪广西省政府建设厅工作，于是返回石康镇的合浦六中任教师。1949年9月中旬，接西大转伪资源委员会通知，分配他到广西平桂矿务局锡矿实习，九月底辞去教师，十月中旬到平桂锡矿实习，任甲种实习员。正当国民党反动政府濒临全面崩溃时，1949年9月初，他被遣散回乡了。

1949年12月3日，家乡解放了，石康镇人民政府镇长韩师淇派他参加石康镇的文教接管工作，同时报请合浦县人民政府委派他担任合浦县立六中暨石康镇中心小学校校长。1950年夏，接平桂锡矿军代表李永泉同志通知他返回平桂锡矿复职，经合浦县人民政府批准后，他于同年冬到平桂锡矿复职。

1950年12月至1980年12月，陈贻芳在广西平桂矿务局（包括矿山）工作整整三十年，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都有进步，为党和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于1956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矿山和矿务局任技术员、主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并兼任副科长、科长、副矿长等职务。曾获得矿、局、省各级领导机关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和物质奖励。

灾难深重的十年浩劫，他有一个儿子惨遭杀害，至今冤情未明，凶手仍逍遥法外；他和妻子、女儿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摧残、迫害、侮辱、歧视，甚至坐牢，尝尽人间的辛酸和痛苦，都是“文革”的幸存者。

1980年10月，组织上调陈贻芳到南宁广西区冶金局有色处任副处长。1981年冬，又调他任广西冶金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高级工程师，并兼任初级技术职称评委会主委，中级、高级技术职称评委会委员，广西金属学会理事等。

陈贻芳现虽年届花甲，但仍在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他决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为四化建设，振兴中华贡献余热。

徐汝竑

徐汝竑是合浦公馆浪坡徐屋场村人，一九一七年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八岁入塾启蒙，一九二九年秋至一九三三年秋在白沙宏德小学就读，三三年秋考入合浦五中初中部，三六年秋至三九年秋在廉中师范科学习。在廉中学习期间，在抗日形势的影响和进步同学的帮助下，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于一九三九年九月由徐永源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就在党的领导下，以教书作掩护，在浪坡、公馆、香山、石湖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组织安排到桂林升学，遂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了桂林。到桂林时考期已过，四二年秋才考上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在大学期间，遵照组织的指示，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加强革命理论学习。四四年秋，日军大举进攻粤汉、湘桂铁路沿线，中大实行紧急疏散，辗转回到家乡并与组织取得联系。四五年春，合浦党举行武装起义，组织通知参加了武装起义。到白石水后被派到地方搞民运支前工作，后敌人“扫荡”，又回到部队跟随部队活动，不久，便由组织安排潜回家乡秘密工作。武装起义受挫后，根据组织的指示，在家乡组织秘密游击小组，等待时机再举。

日本投降后，中大迁回广州石牌原址复课，通知回校复学，遂向组织申请并经组织同意于四六年二月到中大复学，四九年五月底回合浦归队。同年六、七月间在西场地区搞开辟新区工作，八月六万山党委出版《大众导报》时调到该报负责总编辑工作，直至合浦解放。

解放后一直在学校工作。先任公馆中学校长，继任合浦八中（后改为合浦一中）校长，旋调合浦师范任校长、党支书，六二年秋调任廉中校长、党支书，“文革”后改

任副校长、副支书，七八年夏调钦州地区师范学校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八二年十一月批准离休。

张世瑶

张世瑶少年时代便投身革命。现在，他是个合浦县知名的老园丁，他为党的教育事业埋头苦干了三十余年。

张世瑶出生于原合浦县白石水乡勾刀水村（现属浦北县大成乡）。小学时代，他在堂兄张世聪的教育下，知道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难深重。他幼小的心灵上就立下抗日救国之志。1936年秋，他考入廉州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参加了抗日宣传队，烽火剧团、少年抗日先锋队、读书会等先进组织，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等活动。他还如饥似渴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等革命书刊，思想进步很快。他对共产党的领袖十分崇敬，对共产党员十分羡慕，对革命圣地延安十分向往，对共产主义十分憧憬。

张世瑶于1939年冬在白石水乡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有的同志打趣地说，他是哭着鼻子入党的。这年秋末，日寇侵入南宁灵山等地，白石水地下党组织抗日自卫队，准备打游击。张世瑶也正在这时从学校疏散回家，满腔热情地参加了自卫队。东馆党支部见他在队伍中，虽然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细，但是表现突出，觉得他是一条好苗子，于是便由支书岑月英和张世柏负责培养他。他也觉得这批人与一般人大不相同，心里嘀咕着所追求的共产党就在自己的身边。于是，他极其急切地申请入党。有人说他只有15岁，还未达到入党的年龄，不应吸收入党。他知道后便急得哭起鼻子来。后来，经一段时间考验，组织便在这年12月批准了他入党。这时，他又高兴得哭起鼻子来。

1940年5、6月间，反动县长李本清带领反动军队“进剿”白石水。当时，张世瑶从学校回到家里，他当即怒火中烧。这个半拉子便背起比他个子还高的步枪，毅然投入战斗。战斗到第三天，他的堂兄、入党介绍人张世柏不幸牺牲，接着他的村子又被反动派抢光烧光，……然而，在敌人凶焰面前，他并没被吓倒，而是更加坚强地战斗下去。

为了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时机。1941年秋，组织把张世瑶调离游击队。他先到柳州高中念书，第三年秋天，考入华侨工商学院。在这期间，由于广东和广西省地下党省委机关被破坏，使他的组织关系无法转到广西，但张世瑶想方设法与白石水地下党保持联系。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离开了党组织，就象一只失去了方向盘漂荡在茫茫大海上的孤舟。

1945年2月，张世瑶参加白石水武装起义，曾先后担任过合浦县人民抗日游击队

副大队长和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参谋等职务。

1945年12月，组织批准他送爱人去来宾县因客观环境限制，暂时不能回到合浦工作，于是，1946年至1949年他先后在来宾县城厢小学、忻城县中学和来宾县中学等校任教，他一面教书，一面积极找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一批学生在他的教育下参加了游击队，踏上革命的征途。

解放后，张世瑶曾担任合浦县人民政府工商科副科长、秘书、财政科长和钦州专区保险局副局长、股长等职务。曾被评为广西省保险工作的模范。1953年秋，专区保险公司撤销，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材，他苦苦请调到学校工作。他先后任钦州中学、合浦一中、平田中学和廉州中学的校长、副校长和党支部副书记等职，曾被评为合浦县教育先进工作者，同时，还当选为合浦县政协第二、三、四届的常委和第五届的委员。30余年来，张世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心扑在党的教育事业上，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学毕业生，现在这些学生很多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

岑麟祥（1892-1973）

岑麟祥，字玄珍，合浦县廉州镇人。1892年出生于廉州下新桥文蔚坊广文第岑宅，是个封建没落家庭，靠自己谋职业生活，是个自由职业者。

他在省立廉州中学毕业，名列前茅，十九岁考入中西医药函授学校，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曾当过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教员，但长期从事中医，在合浦、钦州、高州、广宁、广州等地行医，也到过越南海防行医，是著名的中医医生。

说到他学习中医经过，颇为有趣。他父亲岑嘉湖是喜欢学武艺的，有一次在高空摔下来，胸部受重伤，由一庸医乱下药致死。岑麟祥那时才十五岁，就立志学医。他买了许多医书，不分中西，潜心攻读，又考入上海中医药函授学校学习，积久渐有所得。他当小学教师时，已开始为人治病，很有效果，他的名气逐渐扩及南路各县，30年代初，广东对中医进行考试，他获得第一名，向他求医的人越来越多。他积累了长期临床的经验，编写了《中西合璧内科新编》、《脉法与经络》等数十万字医书，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逐渐蜚声海内，成了医学名著。

岑麟祥的家庭负担很重，二弟麒祥留学法国，三弟麟祥读中大，自己有三子两女，大儿子岑运彬读中山大学医学院，都需要他接济帮助，他辞去小学教师，到越南挂牌行医，也先后到广州等地行医，在旧社会，当中医收入很微薄的，他在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和税务机关当过职员，维持一家生计，支持弟弟和儿子学业。

搞日战争爆发后，这位与世无争洁身自好的老中医，鼓励儿子岑运彬当军医，上前线，鼓励女儿岑月英参加革命，将石桥口他家作为地下党活动场所，陈任生、何世权、张进煊等同志都在他家住过，虽然家境不十分宽裕，却十分热情招待食宿，并且

是地下党同志的义务医生。白石水武装斗争开始后，地下党处境困难，派人找他，他慷慨解囊，支持武装斗争，并赠诗勉励在山上的同志，使人十分感动。

合浦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工作，在合浦医院当中医生。抗美援朝中，他带头送小儿子运扬和长孙鸿元参加志愿军。1956年，他以精湛的医术，调到广东省中医学院任教授。在学际组织的巡回医疗队中，被群众誉为“神医”。在这段时间内，教学和门诊之余，他致力祖国医学研究和整理自己几十年行医经验，写了许多医学手稿，还编写了许多医案送卫生部审查出版。

正当这个时候，所谓四清运动来了，岑麟祥这个誉满中外的老中医成了斗争对象，被诬为“逃亡地主”“漏网地主”等荒谬绝伦的罪名，被开除公职，强行押送回合浦原籍管制，在“文革”中更受尽折磨，1973年，因大儿子惨死，又贫病交逼，无人照顾，终于含冤死在病榻上。

1980年，广东中医学院为其平反，并收集他的遗著。可惜他晚年呕心沥血写的几十万字医学书稿，在“文革”中，早被合浦打砸抢分子和野心家查抄一空，至今下落不明。

在他逝世前，在埠民南路，有一卖熟食汤粉的老人，得了重病，在垂危的时候，要他家人请岑麟祥诊断一下，有救没救就听他一句话。可是那时这位老中医不准行医，这位老人终于抱恨而死。

一代名医，祖国瑰宝，就这样葬送在那些害人虫手里！可是祖国的医学是消灭不了，人类的正义和良知是抹杀不了，珍珠之乡必然涌现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专家、学者。

岑观海(1891-1968)

岑镇澜，字观海，1891年生于今合浦县廉州镇。岑先生生前历任广东省第一、二、三、五届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五届人大代表，合浦县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合浦县第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合浦县第一、二、三、五届人民代表，合浦专区中医进修班副主任、妇科教师，合浦县中医院负责人、中医内科主任、中医学徒班主任兼教师，系广东著名老中医之一。

岑先生出身于世医之家，其父普光，业医六十余年，擅长妇、内科，尤以妇科为隽，德高望重，为合浦著名妇科医师。岑先生自幼喜欢读书，读完初一后虽因族兄干预面弃学从商——到杂货店当店员，但他仍苦练书画、攻读文史、博览医籍，加上父亲传授临床经验，使他从青年时代起便以医为业。他早年曾在合浦五中（今公馆中学）任校医兼图画教师，在完成本职之余，热情为群众义务治病，深受赞扬。后因校当局发月薪时以假银充数，激起了教职员工之愤，他毅然同部分教师一起辞职返廉。那时，廉州还没有专门的医院，他在家开设“岑氏医室”，接待各地来诊的病人。他重医德

而轻钱财，凡贫者求医，但常常少收费，甚至解囊相助，深得群众赞扬，一直传颂至今。

岑先生曾冒险支持过合浦地下党。39年间，合浦县伪县长派人请岑先生为其老婆治病，他在诊病过程中，获悉国民党当局正策划捕捉在某地秘密开会的庞继业（庞达）等人。庞当时是廉北区地下党领导人，与他是至交朋友。对庞的进步活动。他很支持。他给伪县长老婆开了处方后便匆匆赶回家，迅即设法通知庞。结果，庞等人安全转移。

41年间，岑先生应聘为合浦县监狱医生，他以人道主义精神，热情为狱中“政治犯”治病，并同情他们的不幸，甚至给以可能的资助。“政治犯”陈某在狱中病危时，他闻讯积极抢救，因而被当局视为嫌疑，不久便解聘了他。

岑先生在解放前行医于合浦、廉州、北海、小江以及钦州、湛江等地。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怀岑先生，给了他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但他不仅没有一点彰闻自高，而且更加谦虚谨慎，时常鞭策自己要勤奋工作，多为人民的健康、祖国的卫生事业做贡献。62年，在他的倡议下，合浦办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家中医院，并主持中医师进修班、中医学徒班，培养了一批中医骨干。他曾在广东省某刊物上发表了《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等文章，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他从医五十余年，对历代中医各流派大家的理论特色做过认真探索，特别是对妇科病、热性病和老年病等有很高造诣，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于晚年著有《妇科约旨》、《海庵医案》两书。可惜的是，此两书大部手稿，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

岑先生不独著名于医，对书画金石也颇有研究，其书画艺术别具一格，饮誉廉城。

在“史无前例”那场革命中，素负盛名的岑先生也难以幸免于难，继被抄家、游斗之后，于68年4月14日晚上被人活活打死，终年七十九岁。这是珠乡医学界的一巨大损失。80年，合浦县委对岑先生的沉冤作出决定，平反昭雪。

苏健金（1889-1973）

北海市中医院前副院长、著名中医师苏健今，名廷銮，原字殿金，原籍合浦县乾体（今环城乡乾江镇），但他祖父辈时已迁居北海。

健今于1889年出生，他年青时代就倾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积极参加了革命党人罗侃廷、苏乾初等领导的廉州起义，推翻了清朝帝制的廉州府，于11月17日（农历九月廿七日）成立革命政府一一廉州都督分府。在上级未来得及颁发印信之前，由善于书法雕刻的苏健今用现石篆刻了都督分府大印，以安民告示，行使职权。他功成身退，屡辞官厅的聘请，一意于读书研医，拓碑临池。据说，在三十年代中期，当时的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曾写信要他“出任”合浦县长，他却婉辞不受。由此可见他那种不媚权贵、清高拔俗的品质之一斑。

1917年，他二十八岁时，全国招考六十名公费留学生，报考者达千多之众，他以优异成绩考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为合浦最早的留学生。他在理工科化学系攻读四年，不但精通英日文字；对于中国甲骨文和古籀文也有精深的研究，而且擅长诗文书画，尤以书法见重于世。他学成归国后，在廉中执教近十年，主教英语、化学等科，兼任学监，培养了不少人才。抗战后期，他在原籍创办乾体中学，自膺校董会董事长三年余，为繁荣文化，发展合浦地方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

健今在廉中任教期间，用业余时间向驰名全国的中医理论家、大医师恽铁樵学习函授中医学，随后辞去教师职业，返北海与人合股开办“寿而康”中医店，兼作不挂牌、不收诊金的非专业医生。由于医术精湛，名声鹊起。但他却致力于以理化理论来阐发中药学的研究，同时醉心于金石碑板的考证和书法艺术。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重视，由市中医院医师到副院长，当选为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广东省政协委员、北海市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北海市支部书记等职。他在医学、考古和书法等方面的专长，也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他积几十年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著有《中药今释》、《妇科医案》、《胡卢燕石斋诗文集》、《石鼓文扶桑摹本考证》等，共二十多万字。他曾光荣出席广东省首次召开的“中医拜师会”，在会上被尊为老师，他的名字被载入了《广东名医录》，但他始终没有炫耀过此事。

在十年浩劫中，他那批费尽他毕生精力和财力收集的珍贵古籍，如《吉金乐石录》、各种版本的碑帖、印谱、各家诗文集及医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亲自临摹的《石鼓文》、《流沙坠简》等。文物如明清名家的《百梅图》册页、八指头陀书画扇面、郑考胥行书扇面、曾国藩签发的“通行证”，多种出自名家手刻的印石、端砚、玉器等等，总共三大胶轮车的东西，在一夜之间统统被席卷而去。他也被“勒令”立即“滚回”乾体原籍。临离北海，他所系怀的并非个人的安危，而是上述属于中华民族文明财富的命运，随即给其领导写下了一张纸条；“……红卫兵拿走的一批书籍字画古玩等物，是我多年收藏的珍贵文物，望交国家妥为保存，万勿散失，如此本人虽死亦瞑目也。”字里行间，饱含着他这一位老知识分子对祖国的忠诚热爱。可是，这批属于全民族文明财富的无价之宝，至今还下落不明，实在令人愤慨。

他自66年10月被赶回乾体后，先是租赁他人斗室以栖身，还热情给人看病。69年夏天，大队指派他到乾江卫生所工作。风烛残年的他被戴上帽子，仅享月薪28元，除抱病坚持门诊外，还常常加班加点诊治留医病员，直至逝世前一天仍照常上班。

1973年5月27日，苏健今与世长辞了，终年八十四岁。这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根据《合浦文史资料》第二辑）

岑盛轩(1907-1976)

爱乡港胞岑盛轩先生，1907年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廉州镇人，1976年在香港病逝，终年69岁。

盛轩先生四岁时，父亲岑署楼因病去逝，主要靠母亲安氏抚养长大。他初中毕业后便辍学谋生，依靠亲友的资助，在廉州镇篸行街祖屋与亲友合营纱布、车缝，惨淡经营了一年多，店铺就倒闭了。此后，他跑到广州，初为税务局雇员，后被派往澄海、汕头、海丰、陆丰等地税务局任职。

“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日寇于1938年在海、陆丰登陆，岑盛轩先生逃到香港经商。1940年，日寇侵占了香港，为逃避灾难，他转返广州湾（今湛江市）继续以商为业。1943年，日寇又把战火烧到雷州半岛，他无法在广州湾住下去，遂同后妻蔡常青女士返回廉州闲居。

抗日战争期间，合浦县属的北海等地曾被日寇蹂躏，日机狂轰滥炸廉城等地，合浦人民惨受灾难。1943年，又遭受特大灾荒，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广大群众苦不堪言。当时闲居在乡的盛轩先生，系怀桑梓乡亲，便与友人集资往外省购回大米、衣物一批，当时米价暴涨，他就平糶大米，并把衣物赠送给贫民。此举爱乡之意，深为群众赞赏。之后，在蔡常青女士的建议和支持下，盛轩先生慷慨解囊，在乡助办了不少公益事业。为便于街坊子弟就近上学，培养人才，他赠建本街文蔚坊小学（十三保国民小学）夜务楼一座，署名“盛轩堂”；为发展体育运动和便利交通，他赠资修建县体育场内的梯级蓝球场、阜民南路硬底街道和下新桥；北海镇初建电影院时，他也捐赠资金一笔。对家乡的慈善事业，他也热心资助，捐资扩建和改善盲老院、育婴堂、县医院等处的福利设施。所有这些，都给珠乡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胜利后，盛轩先生和蔡女士继续旅港经商。祖国大陆解放后，他们长期旅居香港。盛轩先生一直萦怀故乡，他虽惨遇两起车祸，致使身残，但为联络乡谊，积极协助筹建旅港合浦、钦州、灵山，防城四属同乡会，并担任该会永远名誉会长。他为团结同胞，统一祖国大业而努力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以法治国 大得人心

法院给严福远平反

长期在我们党领导下，从事抗日进步活动和教育工作的严福远，在广州读大学时参加“中华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后参加我地下党组织，曾任合浦县乾江中学校长。在1952年土地改革时，被人诬告为“不法地主”，被判处死刑，冤死30多年。现经钦州地区中级法院重新审理，撤销原判，宣告严福远无罪，予以平反。

现将钦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原文照录于后：

钦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5]法刑申字第 15 号

申诉人：严宗丽、严宗权、严宗能、严宗仁，是被告人严福远的子女。

原判被告人：严福远，男，广西合浦县人，捕前任合浦县乾江中学校长，一九五二年土改时，经钦州专区以不法地主判处死刑。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和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重新审理。

本庭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严福远为不法地主，破坏土改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原判处严福远死刑，属于错杀，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钦州专区对严福远的刑事判决；

二、宣告严福远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三份，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钦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

审判长 李杰周

代理审判员 邓乃千 庞文富

书记员 招瑞贵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

(编者按)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已批准钦州专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